

記憶

什么时间高机连队
在什么位置？

杨忠之说：这次军里决定调何伯四个高机连队
REMEMBRANCE

分别到军部和江湾机场担任任务是对何伯的信任，
也是陆战队的需要，何伯是军里掌握的高机力量。……
何伯的任务是：担任军部的警卫和江湾机场的防护。
以后还可承担其他的高机任务。”“还告诉何伯汉
奸及看军部院内的地形，看高射机枪放的位置，
准备万一有情况时，如展开。”“还告诉何伯连队
的组成，特别是夜间及有应付紧急情况时的准备。”

摘自杨忠之 12.3.15 交代材料

“你们高机连队，要……
指挥同时没有他伯的……
机也……有……
机连，他伯（甘文臣）……
……”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9月13日第16期 总第19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94期

“九一三”文献（一）

目录

【黑线】

1. 与黑线人物接触谈论问题的情况
2. 参加郑长华、姬应伍请米家农的老婆吃饭和顾同舟老婆吃饭的情况
3. 补充交待材料

【黑会】

1. 参加和召开黑骨干会的活动
2. 参加黑骨干会活动的补充材料
3. 参加三次骨干会议的人
4. 刘锦萍在虹桥机场民航接待室召开骨干会议讲话内容（1971年6月上旬）
5. 周宇驰在巨鹿路招待所召开的骨干会议上讲话的内容（1971年3月初）

【黑言论】

1. 散布攻击言论的问题
2. 散布林贼死党江腾蛟、王维国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反动言论

【黑措施】

1. 关于贯彻执行林贼的“两打”和《空军作战文件》的问题
2. 王维国向高炮三、八师布置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试点训练问题
3. 在军事工作上执行了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黑措施

编者按

这里所展示的文字，来自于空四军原副参谋长杨忠立在“九一三”事件后所写的检查交代。

杨忠立，陕西省固城县人，1937年参加工农红军，1938年入党。他曾长期在野战军部



队、空军部队和各级军事领导机关、高等院校工作，历任：文化教员、侦查、作战、机要参谋、作战股长、副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志愿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军委防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高级防空学校训练部战术系副主任、主任、及训练部副部长、空军高射炮兵第102师副师长等职。曾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1960年被授

予上校军衔。

1992年1月20日杨忠立病逝于上海，享年69岁。他所在的干休所对他的一生做了这样的评价——

杨忠立同志十四岁参加革命。他的一生，是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革命的一生，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身经百战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过许多战斗。先后参加过：晋西北地区反日军的每次扫荡、攻克山西汶水、围攻汾阳战役、保卫抚顺、本溪、通化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攻克鞍山、解放营口战斗、攻克锦州、塔山阻击战、解放桂林战斗和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他长期从事军事工作，认真贯彻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原则，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巩固国防和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杨忠立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工作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谦虚谨

慎、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了革命晚节。

在这盖棺论定的生平里，缺失了一段重要的历史——曾几何时，这位功勋卓著、工作勤恳的革命军人，在“九一三”之后与大批空军干部一样，遭遇了人人自危的命运，出入各种级别的专案组、学习班，没完没了地交代检查。1971年10月4日，杨忠立被上海市委专案组隔离审查，1973年5月19日转入空四军学习班，1974年10月18日结束审查，去了“五七干校”。最后的结论是犯有五大错误。空军批复为“上了林彪的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无论是做副参谋长之时，还是隔离审查之后；杨忠立都以那个年代军人所特有的党性和忠诚，承受着一切。在学习班里，他耐心而认真地把每份揭发或交待材料的提纲、底稿都留存下来，并且还写了日记，正是他这种对己、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才使我们今天能够亲眼目睹这份600多页的珍贵史料。

我有幸看到这些文献资料，端赖上苍的关照和杨忠立的长子杨辉平先生的信任——在经历了几十年多次迁居之后，这些尘封了四十多年的交代材料能够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一页页发黄的纸张掀开了时间的大幕，一个个党史、军史、文革史的片段立体地向我们展开——杨忠立以空四军第一副参谋长的身份，伴随着空四军从“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空军学空四军”的“红”四军，到“九·一三”事件后被撤销番号由胜而衰的“黑”四军；从参与抓捕十四名林彪死党王维国的“爪牙”到疑似王的“党羽”而被组织上隔离审查；从一个开国的红军干部到党籍要不保、行政十一级直降为十六级、即将转业处理……，历经了军第一副参谋长——专案组——学习班——“五七干校”——申诉——保留党籍和原级别离休的这样一个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

从这些材料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林立果、周宇驰在空军的呼风唤雨；从那点点滴滴

滴的交代之中，我们窥见了王维国的言谈和行踪；从那一件件一桩桩挖心掏肺的检查之中，我们知道了空四军与空军、南空、南京大军区领导和上海市委之间的貌合神离，体会到了路线斗争的暗潮汹涌；而那些内容枯燥乏味、重复累赘文字，则让我们理解了“两谋”定论之难，感受到树欲静而风不止。

林彪事件是个“案件”，“九一三”事件是个“空难”，这两个历史遗留的事件至今并没有过去，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读。很多被累及的人，经历浩劫之后都再也不想触碰往事，杨忠立不仅把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而且还将它带回家保留下来，这种不同寻常的自信，预示着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的，敢于将自己的文字面对后人，这正是这些材料的意义之所在。

这些材料原有它的题目，我根据其内容给它们加上了分类的小标题，以期对读者有所帮助。我能够整理并录入材料是杨先生对我的莫大信任，期间又得到杨先生的耐心解答，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于鹏飞

2017.9.11.

【黑线】

与黑线人物接触谈论问题的情况

一、与林贼死党江腾蛟接触谈论问题情况

1.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月间，我和刘炳南到北京参加空军召开的兵员会议时，我们两个到江腾蛟家里去看他时，江腾蛟问了我们一些军机干部变化情况。当我告诉他说，原管理处处长郭凤岗已从东北南空农场回军部（郭调东北南空农场任场长两年多），准备还在管理处任处长，因为管理处现在没有处长。江腾蛟接着说：郭凤岗是个好同志，路线

觉悟很高，人也很老实，也是一个老同志了，不但可以任管理处处长，也可以考虑任军后勤部副部长兼管理处处长。你可以把我的意见告诉王维国，请他们考虑。江腾蛟还说：你们回去告诉王维国，就说是我讲的，要他抓公检法军管工作以外，每周无论如何要抽出时间参加军常委或领导干部的一、两次会，以便了解掌握军的工作情况。

2. 林贼死党江腾蛟在上海治病期间我和李鸿均第一次去看他时谈话情况

一九七一年二月的一天，晚饭前杨其良电话告诉我和李鸿均说江腾蛟在上海治病，今天晚上想见见我们，要我们晚饭后到江腾蛟住处。我和李鸿均晚八时许到了江腾蛟住处。江腾蛟见我们时在场的还有陪同江来上海的空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朱铁生；杨其良陪着坐，时在时不在。谈话内容如下：

江腾蛟说：我这次来上海治病是保密的，所以事先都没有告诉你们。到上海也没有什么人去接。主要是怕外面知道了别人造谣，经一段时间治疗，病已有些好转，既然来上海了，还是要见见大家，今天晚上叫你们来就是这个思想。

我和李鸿均问他病情和身体情况如何？现在生活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江腾蛟说：生活上安排的很好，到上海空四军就是到了自己家里，各方面都感到特别亲切，精神上也感到愉悦舒畅，生活上没有什么问题，病情已有明显的好转，胃激烈的疼痛已停，也不出血了，现在争取不开刀。现在都吃饭了，身体比在北京时好多了。江腾蛟问我们军机关干部变化情况。

我和李鸿均讲了一些军机关处的（指处一级——编者）干部变化情况，其中也讲到有的干部犯了错误。

江腾蛟说：在路线斗争中一定要坚定，要坚持原则斗争，在路线斗争中因怕排挤、怕打击不敢坚持原则斗争，表现不坚定的而犯错误了。为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我是不拍排挤，不拍打击，不拍杀头的。

我们说：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怎么能杀头呢？是杀不了头的！

这次我和李鸿均与死党江腾蛟见面，坐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回来了。除了谈以上问题

外还谈了一些一般生活问题，如胡燕斌找对象的问题。我当时认为江腾蛟是来上海治病的，因为他来上海之前，空政副主任任学耀曾给姬应伍打电话说“江腾蛟现在病很重，需要到上海治疗，请你们给以安排照顾，他是一个好同志。”姬应伍给大家讲过此事。由于江腾蛟在上海治病还要保密，我以为他离开上海也是秘密走的，所以来上海治病为了照顾影响、减少麻烦，故不让外面知道。

3. 一九七一年三月间一天晚上，韩洪奎告诉姬应伍、李鸿均、裴雯、权太万、胡锦涛和我到江腾蛟那里去（江在上海治病时期我第二次见他）。林贼死党江腾蛟谈话内容如下：

林贼死党江腾蛟说：具体请你们来主要是谈一下机关作风和进一步落实“两打”的问题，今天不是鼓励，而要批评你们工作上的问题，给你们泼冷水。可能你们听了会生气，还不服，但为了搞好工作和我对四军的感情，我还是要讲讲。

姬应伍等人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有缺点、问题，“老政委”批评是应该的，请江政委批评，我们好改。

林贼死党江腾蛟说：先讲一下机关作风问题。空四军过去的一套班子，人很精干，工作效率很高，作风上也雷厉风行，深入实际搞试点，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写了不少好经验材料，及时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整个部队的工作，机关工作很活跃，发挥了很大的领导机关作用，这一点过去我是很满意的。但是这些好的作风被很好的保持、发扬。现在你们的机关工作不活跃，不够主动，被动应付，工作效率低，反映情况问题很慢，抓建设性工作少，搞事务性工作多，没有很好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及时有力地指导和推动部队工作，使很多工作软弱无力，没有充分发挥领导机关的作用。据反映现在你们机关的生活作风、秩序、内务卫生等暴露了不少问题，生活作风稀稀拉拉，营内秩序很乱，环境卫生也搞得很不好，不像一个领导机关的样子，这就不适应工作的需要和要求。

因此希望你们对军机关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很好的进行一次整顿，来提高认识、改进思想工作作风，使机关工作活跃起来，变被动为主动，发扬雷厉风行精神，提高工作效率，反映情况问题要快，进一步组织力量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和推广部队好经

验，及时有力的指导和推动部队的各项工作，发挥机关的领导作用，对机关的这个制度、组织纪律性、生活秩序、内务卫生，也要进行整顿改进，要像个领导机关的样子，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关于贯彻“两打”的问题：你们过去在战备训练工作上很平淡，成绩不显著，部分技术、战术水平提高不快，部队战斗力增长很慢，飞行安全也搞得不好；训练改革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在军事训练上没有走出什么路子，创出新经验。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两打”不够，在军事训练中没有突出“两打”的重点内容，没有下功夫抓紧“两打”训练的落实，还是一般的认识。

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好经验，也没有具体推广、落实、学习。航空兵九师由于认真贯彻落实了“两打”，在军事训练中突出了“两打”的主要内容，以“两打”为内容进行了训练改革，因此在部队战备训练工作保证飞行安全上创出了新路子、新经验，训练改革很有成效，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有效地锻炼、培养了部队的战斗作风，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保证飞行安全，给空军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这一点你们要很好学习航空兵九师的经验。（权太万插话说：最近航空兵九师在战备训练、保证飞行安全方面是否总结出了新的经验材料）航空兵九师在战备训练、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有新的发展，昨天他们才给我送来一份新最近的经验材料，可以给你们（材料给了权太万）。

你们今后在战备训练中一定要突出“两打”的重点内容，围绕“两打”进行训练改革，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两打”，很好学习和具体推广航空兵九师的现金经验，在战备训练工作就会创造出新路子、新经验，迅速提高部队战术、技术水平，增长部队的战斗力，并能保证部队的飞行安全。

林贼死党江腾蛟讲完后，姬应伍代表表了态度。他说江腾蛟对我们的批评是对的，是对我们工作上的关怀，提出的问题完全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完全接受，并在今后克服改正。关于整顿改进机关作风和贯彻落实“两打”的问题，我们要很好贯彻认真去做。

林贼死党江腾蛟这次谈话我感觉到就是对我们机关作风和贯彻“两打”不够、不满意而提出了批判，也是向我们吹嘘航空兵九师的黑经验，要我们向航空兵九师学习，进一步贯彻落实“两打”、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和整顿机关的作风。

二、与林贼死党王维国接触谈话问题的情况

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天下午，我从北京参加空军兵员会议回上海后，在王维国家里向他转达了林贼死党江腾蛟要我告诉王维国的两个问题：

（1）江腾蛟说：郭凤岗不但可以继续任管理处长，还可以考虑任军后勤部副部长兼管理处长，要王维国考虑。

（2）江腾蛟说：王维国要抓好军管工作外，每周无论如何要抽出时间参加一、二次军常委会，以便掌握军里工作情况。

然后我向王维国简单汇报了一下空军兵员会议的情况。

王维国接着说：根据司令部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问题来看（当时王维国没有谈具体问题但我意识到指的是管理处在接待工作上、门诊部的工作态度上以及在路线斗争上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司令部的路线斗争教育松了，路线斗争观念薄弱了，因此在路线斗争方面反映了不少模糊、错误认识，有些也是对路线斗争的态度问题。今后再不能放松使其发展了。你们要抓紧路线斗争教育，提高认识，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当时认为王维国就是针对在司令部管理处接待工作上、门诊部工作态度上发生的问题和在路线斗争方面反映出来的一些认识问题讲的。我接受了王维国的批评，并表示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没有抓紧、抓好路线斗争教育所致，今后一定要抓紧路线斗争教育，加强路线斗争观念，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改进司令部的工作。

2. 1970年六月下旬（王维国去北京前），一天下午林贼死党王维国叫我到他家里办公室对我说：空军干部部说你家庭、社会关系上有些问题，你把这方面的情况写个材料给

我，我带到北京去和他们谈谈。

我当时认为关于我的政治历史情况、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在一九五四年审干时组织上已调查了解清楚并作出了结论，不可能是再审查政治历史方面的问题，很可能是我在因家庭成份、家庭社会关系情况影响和涉及到对我的使用和改正的安排问题。因为周建平和郑长华都曾找我谈过，要我不要因别的同志工作有变动而受影响，思想上不要有负担，要正确对待，安心工作，意思是指对我的工作建议待空军批准。

这个问题从我一九六三年到高炮二师工作开始一直到军里工作就存在着。情况我也了解，思想上也有所准备，所以王维国要写一个材料，我就简单的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韩洪奎转王维国了。

3. 一九七一年一月底或二月初，机关整风开始后，在一天下午林贼死党王维国在他家里办公室召集郑长华、姬应伍、李鸿均、裴雯、胡锦涛等人开了一个会，明确党委和机关整风的重点问题和负责人的问题。王维国讲：这次整风发扬民主提意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政治路线、团结、工作作风。重点帮助解决问题的人是胡开德、郑刚、张启文同志。郑刚同志是有错误的，直到现在态度上没有改变，我曾三次找他来，想和他谈心，他都没有谈，他是不交心的。他和周建平搞的很亲近，无事不向周讲，以前他在指挥所值班时，把江青同志乘坐的专机在电话上告诉了在南京的周建平，我批评他，说这是党的核心机密，是不能在电话随便告诉人的。这次整风中要好好帮助他一下。张启文在思想上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政治部要重点帮助他。胡开德对他的错误也没有很好的认识，要继续帮他提高态度。听说政治部机关里对徐光辉的意见很大（指徐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在他带演出队到安吉去，无组织无纪律，公开对抗领导。有人想把徐光辉的问题作为政治部的重点来解决，不能这样搞，这样搞就把整风的立足方向搞偏了。我们一定要明确这次整风着重解决的重点问题，掌握好方向，为使这次整风搞深搞透，真正能做到互相交心，提高认识，解决问题；在普遍发扬民主提意见的基础上，军常委之间、各部领导干部之间希望互相谈心、交换意见，也要找一些干部个别谈，军常委和各部领导干部都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群众

的意见。在互相谈心、交换意见、召开座谈会，思想酝酿成熟之后，再召开各部党委、军常委的交心会。

林贼死党王维国这次开会讲话内容就是策划布置军常委、军机关的整风，明确整风解决的重点问题和重点解决哪些人的问题，唯恐各部和下面把重点方向搞偏了，所以也是一种预防措施。他所讲的整风的步骤办法，实际上是他们搞阴谋打击同志的办法。因为尚未座谈会、交心会等，都是他们事先有目的策划组织安排进行的，整风的事实情况完全证明这一点。

4. 一九七一年七月上旬一天下午，我和张启文到江湾机场王维国的秘密住地（事先我们不知道）见王维国时的谈话情况。当日下午中心学习小组在学习，四点多钟，左平告诉我和张启文，要我们坐一辆专车去见一下王维国（事先我们也不知道王已从汉口养病回上海了，现在自然也就知道了），我们到江湾机场王维国的住地，和王维国谈话情况如下：

我们问他什么时候回上海的？现在身体如何？

我问过说：他回上海已十多天，病好一些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身体还没有恢复健康，因此法西斯分子林立果要他不要急于出去工作，要再休息一个时期。所以他回上海后没有公开出面，也没有告诉你们。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回上海了，那就根本没有办法休息了，还没有决定。王维国接着谈了他在汉口治疗的经过，然后说他从汉口到郑州十五军某师（他过去工作的部队），

见了很多过去一块儿工作的老战友，对他接待非常热情，“他们看见我带去的讲用报告，都向我要”，他就送了该师一部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他们很满意，非常高兴。

接着张启文谈了一些部队路线教育和连队战士谈马列主义著作的情况，并提出26师某人写的一本小说，上海出版社要求出版，我们不让人家出版，说小说的内容有泄密的地方，上海出版社要求我们审查修改后出版。现在经审查认为泄密的地方关系不大，如果再不让其出版，出版部门意见很大，因为人家早就排好版等到现在，投稿人和人家还订了合同的。

王维国说：不准出版一方面是因内容有些问题，另一方面主要是写小说的这个人思想表现不好，所以不能出版；现在如果内容问题不大，对写小说的本人加强教育，也可以让他出版。

我简要地谈了一下五、六月高炮部队空弹射击情况。

张启文说：我们在学习时有人认为尼克松是不会来我国进行访问的，尼克松能否来我国访问，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王维国说：尼克松肯定是要来我国访问的，就在最近尼克松要派基辛格来我国，中央文件上已经讲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那里吃完晚饭后就回来了。

5.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下旬，一天晚上，王维国要郑长华、姬应伍、张启文和我到他江湾机场住处谈话情况。林贼死党王维国说：现在有一份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在广州民航局米家农向他汇报时作的黑指示的记录，给你们传达一下（王维国找记录念了一遍，内容同郑长华在黑骨干会上传达的内容是一样的，故略）。王维国念完法西斯分子林立果黑指示记录稿后说：这一次公开点了吴法宪、卞任农的名字并骂他们是草包。请你们俩（郑、姬）把这个黑指示给军机关和各师团领导干部的黑骨干传达一下，军机关和各部队都要把“红化（‘红化’是文革初期由群众自发形成继而迅速普及到全国的、以革命标语、领袖画像为载体向领袖表示热爱和衷心的狂热宣传现象，与“红海洋”同义——编者）”问题重新研究、整理一次。军部营门外土墙上的“四个伟大”的大字标语写出的时间还不长，字很大，字体好，很新，现在不要动，马上涂掉不好，搞不好会在群众中引起误解，过一段时间再说。

三、与郑长华接触谈论问题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四月一天正在开军党委（扩大）整风交心会时（调动高机连已写了），郑

长华临时把魏忠锦、陈跃贵、刘青峰、王宝奎、车香友、魏士英和我召集到他办公室，对我们说：“现在外面情况比较紧张，社会情况也比较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防止冲击、加强江湾机场的警卫，保证军机关和江湾机场的安全起见，王维国和我们一起研究确定，军里需要抽调掌握一点机动力量。现在就是要让你们研究一下高炮部队在不影响战备任务的情况下，能抽调出几个连来？”

经具体研究只有高炮三师的四个高机连因没有阵地，暂时住在地方学校内，没有担任战备任务，能抽调出来（其中包括已报批上级批准要到军指挥所担任修建任务的高炮八团高机2连）。

郑长华接着说“那就确定抽调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来。让到江湾机场的高炮三师高机连和原来就住在江湾机场的高炮八师23团高机连在担任机场警卫、防护任务上归26师统一组织指挥。”我当时提出要调的三个高机连是否要报请上级批准？郑长华说“这几个高机连没有担任战备任务，不要向上级报告，具体调动由司令部组织。”大家都同意抽调这几个高机连，就继续去参加党委交心会了。

我当时认为郑长华讲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防止冲击、加强军机关和江湾机场的警卫、保证安全起见抽调这几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来，是针对上海市和南京大军区的，因为韩洪奎七零年十一月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指示时就讲过“要准备应付几股势力的冲击”；同时我认为调这几个高机连来也可能是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来上海新华一邨担任警卫任务、保卫安全的，因为当时听说在新华一邨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在修理房子。我在给高机连的干部交待任务时，也讲了除了担任军部警卫任务外，将来可还要担任机动警卫任务，也是指的这个意思（关于调动高机连的问题还要写专题材料，其他问题就不在这里谈了）。

四、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分

杜贵珍、胡锦涛到指挥所会议室、休息室和我谈话的情况

当天上午我在指挥所会议室组织司令部处以上的干部在学习和布置工作。上午十一时分杜贵珍和胡锦涛来到指挥所会议室，正好我已传达完中央转发的广州大军区关于参加“支左”的干部归地方党委统一领导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也到开午饭的时候，我就结束会议，在休息室接待杜贵珍和胡锦涛。他们说：他们是到别的地方去办完了事要回军部去，路过这里来看一下马上就回军部去。指挥所副所长杨述桂问杜、胡二人是否在这里吃午饭？杜贵珍说不在这里吃午饭，我在军部办公室还有个小车子给我运东西来在哪里等着我呢，我们马上就要走。我说：现在已到吃午饭的时间，在这里吃了午饭再回去好了。胡锦涛说：那就在这里吃了饭再走吧。杜贵珍说：那就在这里吃饭，我打电话叫小李子也来这里好了（胡锦涛摇的电话，杜贵珍打电话告诉小李子到指挥所来）。

杜贵珍说：前几天我们军部去了七、八十余人到高炮三师参加他们的讲用会（学习林贼之子讲用报告的讲用会），高炮三师招待特别热情，相比之下我们军对各师来的人的招待就很不够，这些事情你这个副参谋长也应该管管（我说应该管，应该改进）。杜贵珍说：在高炮三师参加讲用时，张启文主任一个要拉着我和韩玉芬向大家介绍，这种做法真使人讨厌！我算老几，为什么要这样搞呢？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以后再这样搞，我就那里再不去。

原来准备要巨鹿路招待所吴振龙去北京把空司军务部郑处长这次（八月份）来上海答应给巨鹿路招待所的两辆北京牌小汽车领回来，前天晚上吴振龙开车出去撞了车，人受伤，看样子一下子去不了。原来要你们管理处协理员石志远到巨鹿路招待所当协理员，你舍不得给，现在不要去巨鹿路招待所了，现在巨鹿路招待所的协理员由干部处另选调人了。我说：石志远不去巨鹿路招待所那很好，管理处确实也离不开。

杜贵珍说：现在后勤部的处、科干部之间有些不团结，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胡锦涛说这些问题很难彻底解决。我说：司令部这一点还好，各处之间还没有闹不团结的事，据

管理员金鸣反映，最近施唯勤、杨以臣和徐多义因没有参加巨鹿路的会议（林贼死党周宇驰讲黑话的黑骨干会），不满意，闹情绪，经常在一起发牢骚，讲怪话，说空军机关干不长了，对下面影响很不好，你们应找他们谈谈，帮助解决一下。杜贵珍说：科、处干部闹意见不团结这也是个原因。我已跟他们谈过，但思想认识上还没有解决问题。以前就跟你讲过，请司令部给后勤部解决一个军械科长或副科长，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军械科没有领导干部，工作也没有人抓，还是要给解决一个。胡锦涛说：司令部那么多的干部舍不得给，不给我们解决军械科的干部，今后高炮部队空弹射击时再要我们派人参加，我们就没有人去。我说：以前给你们推荐过一个军械科的副科长人选，你们认为不理想，不要；司令部的干部你们都了解，你们看谁合适？确实没有什么适当的人，你们在全军内还能选调出一个好军械科长！杜贵珍说：两个演出队合并时，原来在高炮部队当排长的一个干部减下暂时到军后勤部工作，这个人表现不错，适合在连队工作。干部处准备把他放到警卫连去工作，胡部长不愿意让走。胡锦涛说：后勤干部缺的多，这个干部已经到后勤来工作了这样长的时间了还调走干什么？我是不愿意把他调出去的。我说：这个干部去不去警卫连工作我都没有意见，请你们让干部处研究确定好了。巨鹿路招待所魏副所长做招待所工作时间很长了，各方面的关系也比较熟，准备调他到管理处任副处长负责接待工作，管理处也需要这样一个领导干部，你们认为合适不合适？

杜贵珍说：老魏太软，私心杂念重，我看到管理处不合适。我也可能向他们谈过要食堂炊事班长毛阿建当食堂管理员的事，和胡锦涛赶快给招待所人员解决洗澡锅炉问题。

十二时多，杜贵珍打电话要他到指挥所来的小李子（不认识，据说是在军管会工作的一个战士）就到了，给杜贵珍带来一大盒吃的东西，其中有苏州的酸梅干，拿出了一包给我们吃了。这时杜贵珍吹捧了一阵小李子说他会办事，很辛苦等。

十二时半，我们去伙房吃的饭，还有两个炊事员在那里，吃饭中裴寿生去了，也让他喝了一点酒。吃完饭后，杜贵珍、胡锦涛、小李子就一起直接从伙房走了。

杜贵珍、胡锦涛这次到指挥所事先没有告诉我，也没有打过电话。我认为他们是路过

指挥所顺便来玩的，除了一边开玩笑，一边谈论以上问题外，没有谈别的问题，而是三个人（后来加上小李子四个人）始终都是在一起谈论的，没有个别谈过话。

五、一九七一年七月上旬一天下午在林贼死党王维国家里的办公室，杜贵珍叫她的女儿王伏峰给我讲了一下林贼接见她的情况（就是七月一日晚郑长华、姬应伍在巨鹿路招待所开黑骨干会讲的那次林贼接见王伏峰的情况）。王伏峰说：她去时林贼正在参加会议，本来没有时间接见她的。但林贼知道她去了以后，说是上海空四军王维国那里来人了，要接见一下，于是林贼就抽出时间接见了她15分钟。林贼在接见时先问了她的情况，又问了她的父亲王维国的身体状况后吹捧说：她父亲王维国还很年轻，是很优秀的领导干部，要注意不要把身体搞坏了。林贼之妻叶群告诉他：要她父亲不要吃动物油，要多吃青菜，少吃饭，这样开始可能会感到肚子有些饿，但要坚持下去，习惯了就好了，这样就能使身体不发胖，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这也是她的实际体会。

王伏峰还说，林贼夫妇热情亲切地接见她，和对她父亲的关怀，使她非常感动！这不仅是对她父亲王维国的关怀，也是“对空四军的关怀和鼓舞”。

我说林贼夫妇接见你，是对你父亲王维国、对你们一家的关怀、鼓舞和信任，也是对空四军的关怀、鼓舞和信任。今后我们更应该做好工作，以不辜负林贼对空四军的希望；你们对你父亲王维国的身体健康更要关心负责。■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

【黑线】

参加郑长华、姬应伍请米家农的老婆吃饭 和顾同舟老婆吃饭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二月初一天下午，梁金钟通知我：晚上郑长华、姬应伍在巨鹿路招待所请从广州来的米家农的老婆和顾同舟的老婆吃饭，要各部都去一人参加作陪。司令部要我参加，并和其他参加的人一起坐车去。晚饭前我和李鸿均、胡锦生等一起坐车去的。我记得参加吃饭的人有郑长华、姬应伍、杜贵珍、吴凤桥、李鸿均、胡锦生、梁金钟和我等人。

吃饭前在一起做了一会，他们并用水果等招待了我们，这时互相之间也进行吹捧，首先是顾同舟的老婆说：米家农、顾同舟和广空政治部焦主任都想来上海看大家，但因工作离不开，不能来，就让我们来上海向空四军学习。我们来到上海后，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感到格外亲切。你们对我们这样热情接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我们很受感动。今晚大家又来热情招待我们，真使我们有些过意不去了。我首先代表我们俩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一定把空四军的深情厚意带回去，把你们的经验带回去，很好的向空四军学习。

接着米家农的老婆说：我们到杭州空五军、上海空四军的感受和心情，她（指顾同舟的老婆）已代表我们俩讲了。她说，我本来不会讲话，但今天晚上我心情非常激动，我也说几句：我过去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现在我逐渐明白了路线斗争是怎么一回事。真是亲不亲，线上分，四军的同志感情就是深，空四军路线教育搞的“好”，我们要很好地向你们学习。

郑长华说：因为你们就要回广州了，我们今天表示一下心意。你们回广州之后，请向米家农、顾同舟转达我们的问候。欢迎你们以后再到上海来，我们要向广州民航和广空学习，你们在路线斗争、思想革命化建设上，在落实“两打”、布置飞行安全、提高部队战斗力等方面，创造了很多新经验，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姬应伍也表示要向广州民航和广空学习。

他们互相表示之后，李鸿均就和顾同舟的老婆谈起了他们在北京南苑高级航校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并互相询问了现在的家庭情况。接着就开始吃饭了。

吃饭时在敬酒时也互相进行了吹捧。郑长华、姬应伍敬酒时，郑长华说：我们并代表

王维国感谢广州民航和广空对我们的帮助、关怀和鼓励。向广州民航和广空学习。

米家农的老婆和顾同舟的老婆在敬酒时说：他们代表米家农和顾同舟感谢空四军对她们热情、亲切的接待和关怀照顾。向空四军学习。其他人敬酒时也都说向广州民航和广空学习。吃饭后我们就回军部了，再没有在巨鹿路招待所停留，所以也就再没有和他们谈什么。

米家农的老婆和顾同舟的老婆这次到杭州，来上海，现在可以肯定是为林彪、林立果、王维国等人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的串联，制造舆论活动的。她们所说的经验，就是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经验。

米家农的老婆和顾同舟的老婆何时来上海、何时离开上海回广州我都不了解，也没有参加对她们的接送。她们在上海期间，除我参加了请他们吃饭那次以外，她们还搞了一些什么活动，我都没参加，也不了解情况。根据我参加请他们吃饭时听她们言谈表明：他们已去过杭州，即将回广州去；根据她们说把空四军的经验带回去，也看到有人专门和她们谈过问题。这些事情，肯定杜贵珍、梁金钟是知道的，而且要有什么活动，也一定是他们组织的。■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六月六日

【黑线】

补充交待材料

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我是认错了人，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执行了错误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主要错误事实和问题都已经交待过了。现对一些问题的具体情况作一下补充交待。

一、我跟王维国执行了错误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上了党章、宪法，以及在报纸上经常登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林彪直接指挥的军队，“以林彪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等口号，因此我在思想上错误地认为：“林彪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林彪是执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由于形而上学的专机只从表面、形式上看问题，因而不能识破林彪反革命的本质。当时也不敢往坏的方面去想，所以遇事都是往好的方面去想，“总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不会错的”，这就是政治、思想、路线上是根本错误所在。

党的“九大”王维国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空四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支左”工作也收到党中央的表扬，以后毛主席有接见了，我认为这是对王维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就站在“正确方面”的肯定。七零年林彪在北京接见王维国并多次赠送东西，我认为这也是对王维国的信任和支持，“王维国是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因此，我把王维国讲的“我们跟的一条红线”、“我们执行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人直接给我们传达毛主席声音和指示”等假话都信以为真，认为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于是就跟着王维国贯彻执行了一套他的东西。加上七零年初，司令部发生了几个问题：一次是接邱会作老婆的小车队司机因路不好走，未将小车开进院内，而在门口停车，让邱的老婆步行到了院内；一次是林彪的秘书（过后听说）由军部回巨鹿路招待所，蒋国璋向小车队要车，先未派车，以后派车送到南京路百货公司，秘书下车买东西，司机未等即将车开会军部（因家里没有车了）；一次是蒋国璋亲自开的大北京吉普策划，要换车牌，小车队未及时给他换。这些问题发生我虽然做了多次检查并作了教育和处理，王维国扔批评说：司令部路线教育放松了，是路线斗争观念的问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办事人”的态度问题，自己也未执行问题做检查，甚至胡开德、姜国俊就是因因为这些问题开始对王维国大为不满，而受到打

击的。以后，又在一系列特大喜讯中，对稍有异议或态度不够积极的人都遭受到批判。很明显，不跟或跟的不好就是路线问题，就是态度问题，要犯“错误”就要挨整而被打击。因此整机还怕跟不上会“犯错误”挨整，我也就这样逐渐成为被他们利用的骨干，执行了他们的错误路线，北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

林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贯反对毛主席，是党内最大的、最危险的野心家、阴谋家，妄图搞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而王维国则是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忠实干将。自己没有识破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诡计，反而跟他们只想了错误路线，这是我最大的错误。

二、参加多次骨干会议的情况已交代过了，没有什么补充了。

三、军司令部成为知心错误路线的机关我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70年从批判、斗争打击迫害胡开德开始，军司令部的领导权实际上已操纵在左平、徐光辉、陈德福、梁金钟和李维勤五人手里（王维国是通过他们来抓司令部的）。当时入批判李先、胡开德，要想整顿管理处、门诊部和要调换这两个单位的领导干部等都是他们提出的意见、方案，经过军领导或军常委的形式在司令部具体组织实施的。批判李先、胡开德是在他们直接领导和参与下进行的，他们并以军常委工作组的名义派陈德福、李维勤、梁金钟、武杠桥等人负责主抓管理处、门诊部的整顿。我当时被作为考验、争取团结、利用的对象积极具体执行了他们提出的对象（当然不执行的后果也是很清楚），特别是对胡开德的批判、斗争是通过我在司令部组织实施的，我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记得第一次找我谈话的是陈德福。他谈了一些胡开德的问题，提出要调换管理处和门诊部的领导，这两个单位要进行整顿，并推荐了任管理处副处长的人选，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请党委决定好了。第二次会议梁金钟找我谈话，问我敢不敢对李先组织批判。我

说：李先已离开司令部到公检法军管二、三年了，他有什么错误司令部的人也不了解，这不是敢不敢批判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批判，要由军常委决定的问题（在此之前陈德福已在党委会上提出过李先的问题）。梁金钟说李先还是司令部的人，现已由军管会回司令部了，他的问题还要由司令部来组织解决。我说那就请军常委讨论决定好了。以后军常委决定在司令部组织度李先进行批判，并由他们组织了一些军管会的人和李在办公室的人参加，由我组织来对李先进行了批判。以后对胡开德的批判每次都是他们提出并组织而由我主持实施的。

七零年底司令部部党委进行调整，军委确定司令部党委由我主持工作，我继续观察执行了王维国等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错误定性，使司令部逐渐成为观察执行错误路线的机关，我是要负领导责任的。由于我执行了错误路线的机关，使一些同志受到打击排斥，毒害了不少干部，使他们也跟着犯了错误，这是我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当然，王维国在司令部也不是所有问题都通过我、告诉我的，有些问题是王维国亲自掌握的：如通信营的路线斗争教育等是王维国直接向该营布置的，军部警卫连有些事也是王维国直接抓的，有些问题王维国是不谈真实情况的：

七一年征兵时王维国都曾经说过，除了空司、南空分配给我们的女兵数目外，空司王飞副参谋长同意另外增加女兵一、二十名，名曰：“现在每年的女兵都是干部子女，要征一些工作、贫下中农的女兵，掺一些沙子。”这些女兵由谁负责，往何处征集，分配到何处，我是不了解的，也没有问过，我认为可能是到保密部门不需要人XX的工作，以后听说李松亭那里征集了一些（因为领军衣后勤不发才知）。

七一年春，王维国告诉我一个女同志姓罗，要放到军部打字室培养，还要找个教员帮带她，教员由干部处张兆奎负责选调，其他由陶宗义负责，你们给准备房子。小罗到打字室后完全由陶宗义负责管理，关于小罗的事除陶宗义外谁否不能过问，。有一次小罗请假外出，军务处保密室准了她的假，结果受到陶宗义的严肃批评和指责。当时我们认为是给哪个领导干部培养打字员的，所以我们也就不过问这些事情。

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时，王维国在党委会上讲，教导队除学政治外，还要学习一下军事技术。因此要配备轻武器；关于教导队的其他的事情我都不了解，没有过问。

王维国、郑长华在党委会讲要军修厂给飞行员仿造一种小型冲锋枪，并且是直接向军修厂布置的任务，所以我是知道军修厂给飞行员仿造小型冲锋枪的。

至于蒋国璋等干的事，我们既不了解，更不能过问。我是“知道蒋国璋等是搞专案的”，实际上蒋国璋是凌驾于司令部领导之上的，完全由王维国亲自掌握的，他要在司令部搞什么事情是根本经过我们的，我们也管不了他。一次蒋国璋直接要通讯处裴寿生、雷达兵处吴奇炎，给他选调通信、雷达技师，裴、吴向我反映后，我问王维国：蒋国璋要调通信、雷达技师的事他知道不知道？王维国说他不知道，也不知道调技师干什么事。当时我还以为是蒋国璋无组织、无纪律搞的，王维国可能不知道，现在已经很清楚，王维国说蒋国璋调技师他不知道是假的，是回避、掩盖问题实质。蒋国璋直接要司令部三支部给不是该支部的人、也不是司令部的人的李伟信的弟弟办理了入团手续，并要三支部的领导人唐明智等人不要告诉我们。我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揭发出来我才知道。蒋国璋等要有什么事就自己开什么车，不仅不经过司令部领导，我们也不能过问。

王维国还通过别人抓司令部，梁金钟可以说是王维国在司令部的代表，王维国去汉口“养病”就规定要叶蜚闻直接向他报告作战工作情况。

四、传播王维国等讲的一些错误反动言论

王维国等讲的一些错误、反动言论我也进行了传播，除已交代的外现补充一下事例：

1. 1970年十二月在军的科、团干部学习哲学讲用会上，我做了一个关于路线斗争问题的发言。其中主要是联系司令部在路线斗争中的实际情况，说明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是“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用毛主席哲学观点指导路线斗争的”，实际上是执行了王维国等人的错误路线，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搞了错误的批

判斗争，打击好同志，错误地应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这是我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讲用的材料是几个人研究写的，我也参加了研究，主要责任应由我负。

2.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在军党委扩大会上，科、团干部的批陈会议上，我在批判陈伯达反革命罪行时，最后讲了识别领导问题：在毛主席亲自组织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最大的反革命分子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及时识破和揭露了陈伯达这个很大的反革命分子，挖掉了隐藏在党内很大很深的一个隐患，巩固了党，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我们，在每次党内重大的路线斗争，在问题未被揭发之前是不知道，问题揭发后是吃惊、吓一跳，甚至有不少干部跟着错误领导之下的错误路线而犯了错误。原因就在于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去识破刘少奇、陈伯达反革命的真面目。对一些领导干部干也没有看他们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因而上当受骗、跟着犯了错误。因此在路线斗争中，对每个人来讲都会遇到一个识别、选择领导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此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间是要经过各级领导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带领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识别、选择了正确的领导，在正确领导的带领之下，就会保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否则，在错误领导带领之下，就会跟着执行错误路线，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犯错误。

识别、选择领导，在组织上我们不能决定，那是上级领导决定的问题；但在政治思想、路线方面完全有选择的权利。执行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就支持，执行贯彻错误路线的错误领导，就要抵制、反对。选择领导主要看他执行什么路线，而不是看形式、看表面，看他们的职位高低和资历长短，或是上了天安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是好领导，就要紧跟，否则即使错误的领导，就不能跟着他跑。究竟执行什么路线，要看你实际行动，而不是光听他口头上讲。

识别、选择领导，选择是前提，识别、选择不准，跟了错误的领导越紧，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越远；选择了，就要紧跟，就会跟着正确领导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选

择了，不紧跟就会掉队。

这是散布了王维国、周宇驰讲的反动言论，是严重的错误。选择认识到：识别、选择领导的观点，不仅是林彪、林立果、王维国的一种吹捧，而且是违背党的集中统一原则和破坏了党的组织纪律的行为，是他们搞分裂党的“理论”依据。

3.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我在军党委整风交心会上吹捧王维国是“好班长”，“在路线斗争中他是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同时对胡开德同志和郑刚同志错误地进行了批判攻击。这也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把推行错误路线的王维国说成是“正确”的，打击了好同志，颠倒是非。混淆了黑白，是我执行错误路线的严重错误。发言材料虽然是其他几个同志写的，但我要负责任。

4.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司令部在进行路线斗争教育时，按照军政治部和直属政治处的统一布置要求，我向司令部的干部宣讲过海军政治部统一编写的关于路线斗争教育材料。这个路线斗争教育材料以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开始，一直讲到空军、南空和空四军内两条路线斗争情况。这个路线斗争教育材料完全是为林贼及其死党吴法宪、王维国等推行反动路线、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的，它严重的歪曲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把林贼吹捧伪装成执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者；对空军内两条路线斗争情况也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欺骗、毒害了广大干部、战士。我宣讲这个路线斗争教育材料，是我严重的错误。我记得胡寿昌同志根据这个路线斗争教育材料写的提纲，我在军办的参谋班也讲过。

5. 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在领航科长会议上讲话时吹捧了“空间作战文件（林贼之子林立果写的）”，并要求在领航工作中贯彻落实，来进一步研究解决在未来反空袭作战中的指挥引导问题。这不仅是替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了舆论，也是在军事工作上执行反对路线的表现，是我严重的错误。■

【黑会】

参加和召开黑骨干会的活动

一、参加黑骨干会的活动

1.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天下午，林彪死党王维国在军党委会议室召开黑骨干会讲空军肠胃在北京召开会议，解决南空问题的情况。参加会议的有郑长华、姬应武、李鸿均、胡锦生、杨忠立和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黑骨干约卅余人。林彪死党王维国讲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他说，空军党委常委为了解决南空的问题现已召集南空两派和以同等数目的代表人数共三十余人，主要是处以上的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根据双方到北京参加开会的人员态度情况来看，被打击受压制的一方占优势（即王维国等支持的一方）。第一次会议吴法宪打了胡立信“一闷棍”，批评胡立信是两面派，在背后搞鬼，拨弄是非，制造矛盾。想借打击胡立信来施加压力，缓和矛盾、斗争，解决问题，但被胡立信顶住了，现在会议的进展情况还好，司令部的作战、通讯处长等人的发言很好，态度很明确，周建平的态度也很好，刘懋功司令员发言时说他和周建平的认识、观点是一致的，想拉周建平，周建平立即回答说：我和你有原则的分歧，刘环副司令员的发言很短。完全坚持错误立场的也是少数人，估计会议还要开较长时间，斗争还会继续下去。根据会议的发展情况，也可能要空四军和空五军派人去参加，因此我们要做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准备，各部要把对南空领导上的意见材料准备一下，以备开会时用。

会后以部为单位组织参加黑会的骨干进行了讨论，全部是由我主持讨论的。参加讨论的人有梁金钟、叶蜚闻、唐明智、王恒惕、武杠桥、胡燕斌、梁培凯、裴秦生、姜子华、林玉其、李晤云。我当时在发言时认为王维国及时召集会议介绍在北京解决南空问题的情况很有必要，使我们思想上有所准备，是在政治上对我们的关怀。南空问题是路线斗争问

题，是南空领导（刘懋功司令员、于应龙副政委、刘环副司令员等）在杨余傅反革命事件揭发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打击压制了原来的革命派，要搞乱两个军，在路线斗争上搞了反复，由于还没有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使南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我们和南空领导也是路线上的斗争问题，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我们要坚持原则，不拍打击，立场问题解决好，各处都把对南空领导上的意见材料准备一下。

我当时对王维国讲吴法宪打了胡立信一闷棍还有些理解不清，感到王维国这样对待吴法宪还是第一次，给人的感觉吴法宪已站在南空领导一边，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有些理解不清。

2.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军党委会议室和阅览室先后两次召开黑骨干会，由韩洪奎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指示。第一次在党委会议室传达室是处以上的黑骨干参加的，两次传达的内容是一样的，其主要情况如下：

韩洪奎首先讲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接待他的感受：他说，他一到广州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就热情亲切的接待了他，亲自安排他的生活，请他吃饭，派人陪着他在广州游览了一天，认真听取了他的汇报，然后很虚心地说提几点意见供王维国参考。

韩洪奎吹捧说：“林立果对他极其热情，他感受很深，亲切的接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林立果平易近人、谦虚谨慎、认真负责、周密细致、紧张而又秩序的工作作风等使他非常感动，深受教育。”林立果黑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1）要抓好部队打基础的工作。工作重点要放在抓好部队建设工作，要继续集中力量抓好基层，要搞好部队的路线教育和作风培养。

（2）要组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部队的建设工作，不要集中人力为报纸报导写大文章，为报纸报导写文章费力很大，写好了也不一定能登出。你们写的四个第一好的那样好文章，还不是被别人压起来不能发表么（指吴法宪）！上海市不愿意在报纸上登你们的文章，即使登你们的文章也要搞一碗水端平，这样登你们一篇文章，就要引出登别人几篇文章，你们写了文章人家不愿意在报纸上给你们登，别人没有文章还要去找，甚至帮助

写文章登报。所以不要做这样得不偿失、费力不讨好的事，要总结经验指导部队工作，当然，我也不反对在报纸上登韩玉芬那样的文章。

(3) 要准备应付几股势力的冲击。

(4) 三支两军工作要适当收缩，加强重点，巩固重点。公检法军官要加强巩固，文化系统的支左，力量不足时可以适当收缩，有些单位可以撤出来，不要搞得范围太大。

(5) 你们三支两军人员进行开门整风，并普遍开展做群众工作，搞好各方面的关系的做法和效果都很好，可以继续做下去。

韩洪奎第一次传达后，我组织司令部听传达的处以上黑骨干进行了讨论，我当时的表态和认识如下：

我吹捧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这个黑指示很适时，完全适合空四军的实际情况，给我们指明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是对空四军工作的关怀和具体指导，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认为指示要抓好部队打基础的工作，工作重点应放在抓好部队建设工作，要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不要集中人力为报纸写文章，以及三支两军工作要适当收缩，加强重点等，应该这样做。我们对加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还是进行了讨论和组织。

要准备应付几股势力的冲击，我当时思想上认为是指的上海市、南京大军区、南空领导和空军的领导。

3.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一天下午，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巨鹿路招待所会议室召开黑骨干会，由林贼死党周宇驰讲黑话，参加黑会的有军机关各师团和上海民航的一部分黑骨干，林贼死党周宇驰讲黑话主要内容如下：

(1) 空军情况：空军出了败家子，把刘亚楼在建设空军中搞起来的一套好东西（如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政治思想工作抓四个第一的落实、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的培养作风等）都丢光了。

现在空军是在走下坡路，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人组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人管；作战上是打乱仗，连个作战计划方案都搞不出来。北京军区空军还要指挥沈空、济空

和青岛的海空（应为海军——编者），青岛的海空（同前）要起来一架飞机作战，还要经北京军区空军批准才行，这样的组织指挥能完成防空作战任务么？简直是开玩笑，把作战当儿戏；训练质量很差，技术上不但没有提高而且在下降，飞行事故严重的惊人，部队中有很好的训练和保证安全的经验又不总结推广。航空工业造不出飞机来，看规划振奋人心，看现实没有东西。几百架几百架新造的飞机报废不能出厂，浪费惊人；部队作风上稀稀拉拉，问题成堆；干部工作叫做好干部不能用，不好的干部不能不用，空军几十万人连个副司令都提不起来，还是把薛少卿找来党副司令员，真是怪事。

把空军的家当也踢腾的差不多了，现在是到处送人，又到处求人，低声下气，把空军搞成这样子，使我们在空军工作的人，想起来就难过，就气愤！

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

空军几十万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空军建设做出贡献。他们根据实际的体验，过去和现在的对比，逐渐有更多的人认识和看清空军的问题。他们对空军的现状感到不安，进而很不满意，要求扭转、改变这种走下坡路的情况。但是现状也不能感情用事的乱来，组织上还是要服从的。只有使问题逐渐完全暴露出来，才会得到解决，现在这种情况就会改变。（这个问题讲了两个小时，讲了很多具体的情况）

四军所处的地位很重要，一个军要顶几个军用，在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四军面临着大发展的情况，空军要大发展，民航要大发展，四军就是要在大发展中起种子、酵母的作用，要大力培养和储备干部，各级领导班子都配备几套干部，迎接空军的大发展。

二、路线斗争与识别选择领导问题（另写）

三、吹捧法西斯分子林立果

他说：“林立果比刘亚楼强。”刘亚楼是空军的优秀领导者，对空军建设是有很大贡

献的。但刘亚楼和林立果比较起来除了战斗经验这一条之外其他各方面都比不上林立果（从各方面做了具体比较），“林立果比刘亚楼更优越的多”，“现在空军没有人能比上林立果的”，“林立果在空军建设上已经作出很大的贡献”（从各方面吹捧了林立果在空军建设上的功绩），“林立果是个好领导”。“林立果和空军结合空军就有希望”，“林立果下决心在空军干定了，表现了他对空军有深厚的感情，对空军建设有很大的希望和强烈的责任感”。我们大家也应该和林立果一样下在空军干定了的决心，一定要把空军建设好（这个问题讲了一个多小时）。

四、团结和学习问题

他说，空四军的常委和主要领导干部很团结，林立果很高兴，王维国是上海空军的领导，大家要支持他，大家之间、上下之间和各单位领导班子都要很好团结，互相支持，要同心协力把空四军的工作搞好。

要很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好才能工作好。

晚上在巨鹿路招待所讨论时（参加讨论的人有魏忠锦、裴雯、权太万、杨忠立、胡锦生、李世英、车香友、刘志民、上海民航局政治处左平、徐辉、梁金钟、蒋国璋、裘著显等人），林贼死党王维国和周宇驰也去参加，周宇驰又讲了黑话，内容是：

（1）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天才观，我们是承认天才的，但现在不宜在外面议论这个问题，因为说不清楚会引起误会，所以不要去议论、争论天才问题，避免误会。

（2）有的人对王维国未被选进上海市委书记处而感到惋惜，我认为这没有什么惋惜的，我们要那一官半职干啥！王维国未被选进上海市委书记处更主动，我们就不承担什么责任。斗争的暴露不要引火烧身，把矛头都引向自己，要利用各方面的矛盾，让其互相斗争，我们坐山观虎斗。四军要起总预备队的作用，不先发制人，要后发制人，不主动惹事，要待机而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3) 你们现在要埋头苦干，搞好革命工作，少出头露面，显示自己，更不要主动招惹是非，自找麻烦，不要把空四军名声、目标弄得太大，惹人注意，一天到晚忙于应付和处理这些事情而分散精力，总之要使空四军对外的影响越小越好甚至使人忘掉你们更好，以便使你们集中精力抓好部队的工作。

(4) 空军问题的解决也不能急，只有让其把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才能解决，现在就让他继续暴露好了。

晚上在巨鹿路讨论时，我没有发言。第二天在军指挥所休息室我主持参加这次黑会的梁金钟、张红发、唐明智进行了讨论，我表态发言内容如下：

(1) 吹捧林贼死党周宇驰讲的黑话“很深刻、实际、具体、有力，很有说服力，完全反映了空军的实际情况，对自己启发教育很大。

(2) 对所讲的空军现状情况（败家子、走下坡路等）感到非常气愤，认为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是空军领导（吴法宪等）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因此要扭转空军现状情况，与空军领导的斗争也是路线斗争。空军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解决空军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空军现在的情况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只有等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后才得到解决。解决空军问题也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要有信心坚持斗争。

(3) 感觉识别选择领导的观点还有道理，认为“林立果是空军的好领导，”“王维国是空四军的好领导”，都是上面给我们选择的好领导，我们就是要跟他们在空军干，把空军建设好。

4. 一九七一年六月上旬，林贼死党刘锦萍在虹桥机场民航接待室召开黑骨干会，作黑色指示，黑会由姬应武主持。参加黑会的有军机关干部和各师团领导的黑骨干共约六十余人。刘锦萍讲话主要内容如下：（在另页）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两个誓死捍卫，有的人要抢班。

林贼死党刘锦萍作黑指示后，没有组织讨论，当时给我的感觉和印象是：进一步说明了空军吴法宪等执行的是错误路线，现在在打击、压制、挑拨刘锦萍等一伙，并影射似乎

吴法宪也在反对林贼，觉得路线斗争太复杂，有些理解不透。刘锦萍讲话是动员和鼓励大家向执行错误路线的吴法宪等空军领导坚持斗争。

5.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晚上，郑长华、姬应武住在巨鹿路招待所召开黑骨干会传达林贼接见死党王维国女儿王伏峰的情况。参加黑会的人有魏忠锦、刘忠林、张启文、李鸿均、杨忠立、裴雯、胡锦涛、梁金钟、潘玉昆、孙洪奎、杜贵珍、左平、张兆玺、徐辉年、叶蜚闻、李红泉、刘志民、陈耀贵、李世英、刘包文、车香友、魏士英、刘跃如、王敦然、第三医院的副院长等三四十人。

黑会由郑长华主持，姬应伍传达了林贼接见死党王维国女儿王伏峰的情况及其意义，并提出了几点要求，接着进行座谈讨论。

我表态发言说：林贼接见王伏峰是有很意义的，听了接见王伏峰的喜讯感到很亲切，心情激动，很受教育，这次林贼接见王伏峰是对王维国的关怀和鼓舞，也是对空四军的很大关怀和鼓舞。决心以做好工作的实际行动来回答林贼对空四军的关怀和期望。

6.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郑长华、姬应伍在四平路军指挥所情报室召开军机关和各师团领导干部的黑骨干会，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在广州民航局米家农向其汇报（因红化问题吴法宪、邝任农在几千人大会上批评米家农的问题）时作的黑指示，其主要内容如下：

法西斯分子林立果说：昨天的事（指吴法宪、邝任农因红化问题在大会上批评米家农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没什么了不起，要坚决顶住。他们（指吴、邝）在路线上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从来没有见他们检查过。去年有人出国经过广州时，将你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红化中的问题报告了总理，周总理批评了你们，你们已采取了措施。他们（指吴、邝）批评的问题是现在根本没有的情况，把过去什么时候的虚的情况、问题拿到现在来大做文章，搞没有事实的批评是别有用心的。

语录、标语牌和挂像多的用不了的可以输送分散到下面场站去，下面还是不受局限的。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个新生事物，要爱护扶持它，要保留下来，今后不对外宣传演出，主要对自己内部各单位演出，也可以到兄弟单位互相演出。

传达后没有组织讨论。我感到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等与吴法宪之间的斗争已到尖锐表面化的程度。我们对机关的红化按照严肃、适当、大方、整洁、少而精的原则进行研究调整。

7.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军部指挥所情报室召开参谋干事以上的黑骨干会，讲发挥黑骨干的作用问题。主要内容是：

林贼死党王维国说：骨干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路线上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前进。有些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把骨干的任务局限于办一些具体事，参加一些会议活动上，参加了就高兴，认为是对他的信任，，没有参加就不满意，认为对他不信任；也有人骄傲自满搞特殊、怕困难、严重脱离群众等，这算什么骨干分子，根本起不到骨干的作用，他们是为私当骨干，而不是为“革命”当骨干。这些问题必须纠正克服，办一件事和召开一次会议，总不能所有骨干都要一起参加，这不仅完全不必要，也不可能。根据工作性质和需要，必然是这件事这些人办，那件事那些人办，参加会议也是一样，这完全是正常的，根本不存在对谁信任、对谁不信任的问题，为什么还要怀疑呢？归根到底还是觉悟不高，思想上的问题，认识上的错误。所以必须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正确理解骨干的任务，才能充分发挥骨干的积极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骨干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团结教育、带领群众的作用，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和理论思想水平，才能做到在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明确，辨别是非，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团结、教育、带领群众才有条件和可能，才会引导群众执行正确的路线。

(2) 骨干团结、带领群众要靠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政治思想上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提高认识觉悟，团结、带领群众才能形成。不做工作，特别是不做政治思想工作，团结、带领群众就是一句空话，不仅不能团结、带领群众，甚至是自己脱离群众，陷入孤军一人。

(3) 作风上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起到团结、带领

群众的作用。

林贼死党王维国讲话后，以部为单位组织讨论，司令部参加黑会的人分两个组，我和裴雯分别主持进行了讨论。

我在发言时说：王维国的讲话是对我们骨干在政治思想上的关心爱护和希望。指出的问题完全反映了骨干中存在的错误认识和不正之风。作为骨干来说有这些问题是严重的，指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提高认识、纠正改进，我们应该严肃、正确地对待，认真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进行检查，对发挥骨干作用提出的要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作为一个骨干分子应该做到的，我们要以自己的行动来贯彻落实。我对吴振猷在巨鹿路一些思想工作的问題提出了批评。

8. 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党委会议室召开传达（科、处以上的一部分黑骨干参加），郑长华、姬应伍、张启文、李鸿均、胡锦涛也参加了一些的黑骨干整风会，解决陈德祐、李维勤的问题。会议开了一个星期，会议直接由王维国领导，由裴雯（组长）、韩洪奎、梁金钟（副组长）三人主持的，我是参加几次会，没有全部参加，王维国最后总结时我也没有参加。

会议进行到中间，王维国又把与陈德祐、李维勤问题有关的雷达二团的吴副政委、王敦然和第一医院的宫健（第一医院政委——编者）弄来参加了会，领着他们揭发批判陈、李的错误，也是对他们（雷达二团吴副政委等）的批判。

在会上我没有发言，从揭发出来的问题我感觉到骨干中问题严重，严重的不团结。王维国组织黑骨干整风，原来所谓的五人领导小组（左平、徐光辉、梁金钟、陈德祐、李维勤）只剩下左、梁、徐，而参加这次整风领导小组的只有梁金钟一人，骨干的领导层有变化，是重新整顿的时候了。

五、对参加和召开黑会活动的认识

林贼死党周宇驰、刘锦萍、王维国召开的黑骨干会完全是秉承其黑主子——叛徒、卖国贼、法西斯分子林彪、林立果的反革命旨意，组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勾当。他们在黑会上，大肆吹捧林贼父子，贩卖其反动观点，造谣、污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大造反革命舆论，拉拢、组织、培养、利用骨干作为其反革命活动的工具和组织准备。搞阴谋诡计为其反革命作准备就是黑会活动的目的。

我因认错了人，站错了队，执行了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路线，并被作为骨干参加了王维国等人召开的黑会活动，接受了他们的反动观点；自己是召开了四次黑骨干会，传达了两次黑会内容和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与林贼死党王维国的黑指示，吹捧他们，为他们搞反革命活动制造舆论，为执行其黑指示组织活动，这都是为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在卖力、勤劳。参加和召开黑骨干会活动的错误就是参与林贼及其死党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错误，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

【黑会】

参加黑骨干会活动的补充材料

（一）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韩洪奎在黑骨干会上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指示内容的补充：

1. 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在讲三支两军各自时说，现在的方针是调整、充实、巩固、提高。
2. 韩洪奎第一次在党委会议室给处以上的黑骨干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黑指示后，林贼死党王维国讲了以下内容的话：

林贼死党王维国说，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指示很重要，是带战略性的措施，是有深远意义的，我们要认真讨论，具体研究落实措施，坚决贯彻落实，我们上面有强大的政治力量，能及时给我们工作以具体有力的指示，这是我们十分优越的条件，也是其他部队没

有的和不能和我们相比的，在这样优越的政治条件下，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黑指示的内容要注意保密，不要外传。

（二）一九七一年六月上旬，林贼死党刘锦萍在虹桥机场民航接待室召开黑骨干会作黑指示内容的补充：

林贼死党刘锦萍在讲路线斗争时说：现在路线斗争并没有停止，而且更复杂，空军本身就存在着执行什么路线问题，空军存在的问题就是路线斗争问题，空军领导人现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自己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反对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在空军起了特殊的作用，支持保护了他们，才使得空军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现在是忘恩负义，以怨报恩，却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领导”法西斯分子林立果，采取执行反对的政策。，对林立果这样好的黑《讲用报告》在空军领导机关和部队不让组织学习，一般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讲用报告都可以印发，号召普遍学习，为什么林立果这样好的《讲用报告》反而不让学习呢？对林立果这样好的作战文件也限制学习研究落实。空军飞行训练技术提不高，事故严重的惊人：空军领导束手无策，漠不关心，而林立果在广州航空兵九师蹲点，搞调查研究，进行保证飞行安全，防止飞行事故，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是航空兵九师转危为安，保证了安全，迅速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改变了整个部队的思想精神面貌，成功的创造了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解决了防止飞行事故的“老大难”问题，对空军建设上做了很大贡献，但空军领导却冷漠相视，不仅不提倡推广，而且是压制限制，甚至不让别人去学习，这就是路线斗争问题。现在在空军有人推行错误的路线，反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立果”，我们就是要坚决支持、拥护“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立果”，贯彻执行其“正确”的指示，在林立果带领下“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把空军建设好。这就是空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当前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是：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有些反对毛主席、反对革命路线的人，他们不敢直接反对毛主席，而

通过反对忠于毛主席、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妄图达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目的。现在有的人就是反对林彪，不承认其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我们就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誓死捍卫林彪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错误的路线，这就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我们一定要坚信我们“执行捍卫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地。■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

【黑会】

参加三次骨干会议的人

一、1970年11月，韩洪奎从广州会上海后传达林立果“指示”的骨干会议，参加人员如下：

分两次传达的：一次在党委会议室，参加的三十余人；一次在军部阅览室，参加的有五、六十人（都是军机关的），两次传达的内容完全一样，都是照笔记本讲的。

参加的人有：王维国、郑长华、姬应伍、魏忠锦；

司令部参加的人有杨忠立、裴斐（？）、权太万（？）、梁金钟、叶蜚闻、王恒阳、裴寿生、张敬发、蒋金龙、唐明智、李胜良、胡燕斌、梁培凯、林玉其；巨鹿路招待所吴振龙、门诊部武杠桥、王秀芬也可能参加了。

政治部参加的人有：张启文（？）、李鸿均、左平、徐光辉、陈德福、张兆玺、潘玉昆、徐多义、牛进才、杨其良、常青海、徐菊才（保卫处副处长）、王东升（秘），还有一些干事和秘书参加。

后勤部参加的人有：胡锦生、蔡子悟（参加的第二次）、杜贵珍、施淮勤、李仁泉、

林承英（军需科副科长）；宫键、韩玉芬也参加了。

参加第一次传达的大都是科、处以上的干部。

空军政治部干部杨副部长等四、五人也参加了。

二、1971年2月份，在巨鹿路招待所听周宇驰讲话的有下列人员：

王维国、魏忠锦（郑长华到北京开会，姬应伍到安吉给拉练部队传达中央关于批陈整风的文件去了，他们没有参加，回来有可能看了记录）、杨忠立 i、裴斐、权太万、梁金钟、张敬发、唐明智、李鸿均、韩洪奎、左平、杨其良、常青海、武杠桥、蒋国璋、冼楚先、郭永诚、孙秉才、陶宗义、保卫处唐副处长、过全、张兆玺的爱人、张兆玺、潘玉昆、胡锦涛生、杜贵珍、李仁泉、林承英、高炮八师王宝奎政委、刘志民师长、独五师师长杜先照、十五师师长李世英、二十六师师长车香友、政委魏士英、宫键。

民航局政治部主任等人。

晚上讨论参加人有：

王维国、魏忠锦、上海民航局政治部主任、权太万、裴斐、杨忠立、胡锦涛生、刘志民、李世英、车香友、梁金钟、左平、韩洪奎、蒋国璋、冼楚先。

三、1971年6月上旬，刘锦萍在虹桥机场民航接待室召开骨干会议参加的人如下：

姬应伍、张启文（？）、李鸿均、左平、徐光辉、张兆玺、潘玉昆、常青海、杨其良、徐多义、蒋国璋、冼楚先、郭永诚、魏忠锦、杨忠立、梁金钟、裴寿生、叶蜚闻、刘忠朴、刘志民、陈跃贵、车香友、魏士英、李朝义、胡锦涛生、李仁泉、施淮勤、权太万、牛进才、蒋金龙、朱仁堂。

参加以上三次骨干会议的人，仅是我参加会议时的印象回忆的，不是十分精确的，可能有差错，也肯定有遗漏的，因为通知参加各次会议的人员名单我是不知道。■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黑会】

刘锦萍在虹桥机场民航接待室召开骨干会议讲话内容

(1971年6月上旬)

他说：空军现状什么事情都没有人管，没有人负责抓，如路线斗争教育。毛主席早有指示、也早传达了，中央也有布置，已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空军领导也不布置路线斗争教育问题，也不提出路线斗争教育方案，路线斗争教育到现在都是部队自己组织进行的，空军领导干部没有抓，也没有总结和推广部队路线斗争教育的经验。空军领导连党的基本路线都不知道，说什么“九大”就是党的基本路线。不久，受了中央的批评，现在不得不应付一下，才在北京召开路线斗争教育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就是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座谈会，才下来到各部队看看。听说你们四军参加座谈会的人，在座谈会上介绍路线教育的经验，根本不应该在这样的座谈会介绍路线教育经验的，因为你们再好的经验他也不会给你们推广的，搞不好，还要挑你的问题，抓你、批评你，或者在他们正需要的时候帮了他的忙，介绍经验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空军领导是不会采纳我们的建议、意见的，路线斗争教育还是要靠你们军自己搞，不要依靠空军。

现在路线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斗争更复杂，空军本身就存在着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空军存在的问题就是路线斗争问题。有的人自己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还反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要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坚定，要敢于斗争，要顶得住，不怕压，不怕打击和排挤。他说，“我自己在路线斗争中是不怕压，不怕打击、排挤，在路线斗争中我是不怕杀头的。”

大家要支持王维国的领导，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也吹捧了王维国）。

还说了要改进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要大家不要搞表面形式的东西，来往人不要组织人迎送，要注意影响，要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

【黑会】

周宇驰在巨鹿路招待所召开的骨干会议上讲话的内容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

一、空军的情况

空军出了败家子，把刘亚楼在空军建设搞起来的一套好东西都丢光了。现在空军在走下坡路：列举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思想工作、作战训练、作风、航空工业等为例。干部工作，把空军的家当也踢腾得差不多了，到处送人，又到处求人，低声下气，把空军搞得灰溜溜的。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

空军几十万人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现在逐渐认识看清了空军的问题，对现状感到不安，很不满意，要求改变这样走下坡路的情况。

但现在不要乱来，组织上还是要服从的，问题逐渐暴露以后总是会有改变这种情况的。

二、识别选择领导问题

在路线斗争中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遇到一个识别、选择领导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同时我们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要经过领导带领我们贯彻、识别、选择了正确领导，在正确领导带领之下就会保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否则在错误的领导带领之下就会执行错误路线，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犯错误。

识别、选择领导在组织上我们不能决定，那是领导上决定的问题，但在政治思想、路线方面完全有选择的权利。正确的领导就支持，不正确的领导就要抵制、反对。识别、选择领导主要看他们只想什么路线，而不是看他职位高低和资历长短。只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就是好领导，就要紧跟，否则就是错误的领导，就不能跟着他跑究竟只想什么路线，

要看实际行动，而不是看表面现象和口头上讲的。

石碑、选择领导，感情是前提，识别、选择不准，跟错误的领导愈紧，北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愈大。选准了，跟着正确领导就会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选准了就要紧跟，否则就会掉队。

三、林立果的情况

林立果比刘亚楼强，选准空军没有人能比得上林立果的，他从各方面比较（讲了林立果在空军建设上的“功绩”，并从各方面吹捧）“林立果是个好领导”，“林立果和空军结合空军就有希望”，“林立果在空军干定了的决心，表现他对空军有深厚的感情，对空军建设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强烈的责任感”，周说我们大家也应该这样干。

四、团结、学习问题

吹捧了王维国，要大家支持王维国。

说四军常委很团结，林立果很高兴。

大家之间，各单位领导上、下之间要很好团结互相支持，要同心协力搞好四军工作，要很好学习。

在讨论会上讲：“我们是无产阶级天才观，现在不要议论这个问题，因说不清楚会引起误会；王维国未被选进书记处更主动，不承担什么责任；埋头搞好本军工作，搞好与外面的关系，少出头显示自己；空军的问题，只有让其彻底暴露出来才能解决。” ■

【黑言论】

散布攻击言论的问题

林彪死党王维国等为了搞分裂党的反革命阴谋，大肆造谣、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许世友司令员、上海市委领导和南空领导，我散布了王维国等人的以下攻击言论。

一、散布攻击南京大军区许司令的反动言论

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我在南京参加南空党委扩大会期间按，我和梁金钟、李维勤、叶蜚闻、姜志华、杨云辉在一起谈论问题时，我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错误路线，打击镇压了每个群众，支一派，压一派，不搞革命大联合，大军区已向党中央做了检查，中央已有批示，以后还可能向下传达。”

2.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我和梁金钟、林玉其、叶蜚闻、王恒阳、陈亮、姜志华等人在一起议论苏南支左问题时，我污蔑、攻击二十七军“在苏州、无锡地区支左犯了错误，违背中央指示，支一派、压一派，把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内的一派打出了苏州、无锡，跑到了镇江、上海，不让其回去，引起了武斗。”我更吹嘘说：“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给被打出来的一派工作，让其回苏州、无锡搞联合的。”

3.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到在越南执行任务的高炮四师，向该师的领导干部张启文、马金原、赵官政、马福生、刘青峰散布了污蔑、攻击许司令员的反动言论，我说：“‘杨、余、傅’反革命事件被揭露后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未请示毛主席、中央军委，擅自决定派陆军部队进驻盐城、如皋机场，要接管南空各机场，受到了中央的批评。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空军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决定，就是针对许司令员的。”

4. 一九六九年五月我在办公室和梁金钟、叶蜚闻、王恒阳个别议论时，散布了污蔑、攻击许司令员“不讲团结”的言论，我上：“听王维国讲，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时，他和

陈励耘做在一起，姚文元同志坐在他们附近。许司令员走到姚文元同志坐的地方时，姚文元指着王维国、陈励耘坐的地方对许司令员同志说‘他们两人坐在那里，你和他们见见面，以示团结’，许司令员听了姚文元同志的话后，转身走了。”

5.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南京大军区召开党代大会期间，我在办公室向梁金钟、叶蜚闻、王恒阳、姜志华散布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的言论，我说：“王维国在常委会上讲，在南京大军区召开的党代大会上，二十军受到了排挤、压制，不让南萍在大会上发言，南萍抱着话筒一定要发言，顶抗了南京大军区的领导，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后来还是黄总长打电话给南萍做工作，要他不要这样，才使会议开下去。”

6. 1970年一、二月，我向司令部的处长们传达军委会议精神时散布了污蔑、攻击许司令员的言论，我说：“黄总长在军委会议上讲，南京大军区提出的反许乱军的口号是错误的（是王维国传达时讲的）。”

7. 1970年五月初，我在办公室向梁金钟、叶蜚闻、王恒阳、王辉章个别散布了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不关心毛主席安全的言论，我说：“王维国在常委会上传达毛主席接见他的情况时说，汪东兴同志讲，几次要南京大军区在南京给毛主席修一条专线停车站，到现在也没有修建，使毛主席乘坐的专车在南京停留在安全上没有保证，因此这次毛主席会北京时，原不准备在南京停留，以后还是毛主席说，还是要在南京停一下。”

8. 1970年三月，我在向司令部处以上干部传达王维国在常委会上关于“两忆三查”问题的讲话时，散布了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的言论，我说：“王维国在常委会上讲，南京大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印发给部队进行‘两忆三查’的教育材料——过去战争时期，山东潍坊县委给九纵队的一封信的内容有错误，是散布战争恐怖，姚文元同志看过该信后，也认为该信的内容有错误，是散布战争恐怖，不应该在地方和部队进行教育。我们部队有的单位未经请示报告利用该信进行了教育，已受到王维国的批评，我们机关各单位再不要拿该信进行教育了。”

9. 一九七一年二月，我在办公室向叶蜚闻、梁金钟、裴寿生、姜志华、唐明智散布了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在打击‘516’反革命分子时搞了扩大化”的言论，我说：“王政委在常委会说，南京在打击‘516’反革命分子问题上搞了扩大化，违背了中央的政策，把过去凡是反对过大军区、军分区和县人武部的人，都被当做‘516’反革命分子来进行审查和打击，有的军分区和人武部关于打击‘516’反革命分子的文件上和张贴的宣传材料也是这样写的。以反对过大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来划分和确定‘516’反革命分子。我看他们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10. 一九七一年四月初，我在办公室向司令部的处级干部传达王维国在军党委会上的讲话时，污蔑、攻击苏州市的领导“将一个过去的女造反派打成了‘516’份子，被关押起来，该女人逃跑到北京找中央告状，北京有关部门让其仍回苏州市处理，该女人到释放时即被苏州市来的人带走了。”

11. 一九七一年一月，部队进行野营拉练时，我向姜志华、廖振华、单清泉、何超、周柞德散布了分裂言论，我攻击污蔑“苏南地区的领导不欢迎拉练部队去，地方上对部队进行野营拉练没有很好布置和准备，群众对拉练部队不热情。”吹捧“浙江省革委会、二十军、省军区和空五军对部队野营拉练工作很重视，各地布置准备的很周到，对拉练部队很关心，浙江省的人民群众觉悟高，对拉练部队很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部队很受教育。”“两个省，两个样，不是人民群众的问题，而是领导问题。”

12. 我还在司令部处级干部中散布过王维国攻击南京大军区“不挂林彪的像，不用林彪的语录，不敬祝林彪身体健康”的反动言论。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在办公室召开处级干部会时散布攻击南京新华日报时把“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像片说明改成‘毛主席和他的战友林副主席’。”

二、散布攻击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反动言论

1. 一九六九年七、八月我向司令部处级以上干部讲十三厂“支左”问题时散布了王维国攻击王洪文同志的言论，我说“我们在十三厂担负警卫任务的警卫排，因十三厂的一派组织故意打了我们的战士，为了不使问题发展，我们已将该派撤出十三厂，今后再也不派警卫部队到十三厂去了。十三厂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至今两派未联合，革委会成立不起来，而且不断发生武斗，冲击我们军机关，主要是王洪文同志领导的上海工总司支持的一派，不搞联合，一定要打击消灭另一派。两派的几次协议都不能贯彻执行，我们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两进两出，空军直接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是两进两出，现在警卫排也被赶出来了，军常委确定今后我们军不和十三厂发生任何关系，任何问题我们都不插手，由他们去搞算了。”

2. 1970年十一月，我在司令部处以上的黑骨干讨论韩洪奎传达的林立果的黑指示时，散布了攻击徐景贤同志的言论，我说：“上海市报纸在登我们报导文章时，徐景贤同志讲要一碗水端平，要登我们的报导文章时必须登别人的文章，别人没有文章时就要去找，甚至帮助别人写文章登报，其目的就是不愿意登我们的文章。因此，我们今后主要是总结经验指导部队的建设工作，不要花费力量向报纸写稿。王政委已规定不让向上海报纸投稿。”

3. 1970年十月，我在办公室向梁金钟、叶蜚闻散布了攻击徐景贤同志的言论，我说：“听说徐景贤同志在上海市某次会议上批评我们军在上海歌剧院‘支左’的人员因批判造反派的头头而犯了方向、路线上的错误，要我们进行检查和严肃处理。这是无限上纲，有意整人。批判造反派头头看是什么问题，不能说批判造反派头头的严重问题就是犯了方向、路线上的错误。”

4. 1970年十月，我在办公室向梁金钟、叶蜚闻、裴寿生、唐明智散布了王维国污蔑、攻击张春桥同志的言论，我说：“国庆节前夕，王政委到张春桥同志家里去检查警卫安全工作时，张春桥同志的秘书告诉王政委，张春桥同志正在忙于修改文件，没有时间接见他。工作再忙见个面，打个招呼是可以做到的，看样子是不愿意接见王政委。”

5. 1970年十一月，我在办公室向叶蜚闻、梁金钟、裴寿生、唐明智散布了王维国污蔑、攻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否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我说：“上海市革委会组织领导的给上海市党代大会起草的政治报告第一稿上对人民解放军只提了一句；第二稿对人民解放军连一句也没有提。上海市第四次党代大会的政治报告主要是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作，政治报告上不提解放军是不对的。”

6. 1970年十一月，我在部党委会上传达军常委确定的我们军出席上海市第四次党代大会的代表人选情况时，散布了王维国攻击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和警备区周纯麟同志的反动言论，我说：“召开上海市第四次党代大会的准备工作，推选出席党代大会的代表，酝酿讨论新市委委员、常委和正副书记的人数、候选人等工作，在地方上早就通知进行了，马上就要召开党代大会的预备会才通知我们提出出席党代大会的代表名单，现在有的人为使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被选入新市委书记处，到处宣扬他，甚至说周纯麟司令员是‘九大’的代表和候补中央委员，周纯麟同志也到处检查说警备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上的错误，反正他不是当事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还没来警备区工作，大的错误也没有他的份，只能说明他检查的姿态高。”

7. 1970年十二月，我在办公室向梁金钟、叶蜚闻、裴寿生、唐明智、姜志华散布了王维国在公检法问题上污蔑、攻击上海市革委会领导的反动言论，我说：“听说在市革委会领导人开会时关于公检法问题是搞一个专政机构、还是搞两个并列的专政机构问题是展开了争论，实际上是以军管会在实行专政，维持社会治安上不走群众路线、不依靠‘文攻武卫’组织来压我们，想把‘文攻武卫’组织搞成一个专政的领导机构，甚至代替公检法的专政领导机构。上海的‘文攻武卫’组织自己可以抓人、审人，全国只有上海是这样。根据中央的决定、指示，各地的专政领导机构只能有一个——就是公检法军管会：对敌人实行专政、破案、维持社会治安，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才能搞好，但群众组织不能代替专政机构，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

8. 一九七一年一月在安吉县野营拉练时，我向姜志华、廖振华、单清泉等人散布过攻击姚文元同志的言论，我说：“听说姚文元同志这次从北京回上海参加上海党代大会时，我们军的几个领导同志去虹桥机场接他，他除了和王政委握手外，军的其他的领导同志既没有握手也没有别的表示，这还是第一次这个样子，过去对军里迎接他的人很热情，对空四军很好。

9.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在一次部党委会开会之前，有人议论到要汽车和坐汽车的问题，并提到王洪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不坐卧车，向我们军借吉普车坐，现在是不会要吉普车坐了。我说：“过去有卧车不坐，要坐吉普车，现在地位变了，坐卧车，还要坐好的，和文化大革命时就不一样了”散布了对王洪文同志的攻击言论。

10. 我还向司令部处级干部散布了攻击上海市委领导“不用林彪的语录，开会不敬祝林彪身体健康，有的发言稿上写上了林彪语录也被勾掉了”的反动言论。

11. 一九七一年七月份，国家体委通过空军要调我们三个乒乓球运动员，王维国、郑长华不愿调给，八月初，我派王秉东去北京了解体委调我们三个乒乓球运动员的情况和通过关系要求免调的问题。王秉东去北京时我向他交待任务时攻击了上海体委，我说：“我们军部今年刚组织了一个乒乓球队，现在国家体委通过空军要指名调我们三个队员，估计是上海体委乒乓球队的领导对我们军组织乒乓球队不满意，在国家体委向上海调乒乓球运动员时，他们在背后搞鬼，想挖我们的墙角，搞垮我们的乒乓球队而向国家体委推荐的，因为国家体委是不知道我们乒乓球队，更不了解有什么人。你和符志行很熟悉，他在体委负责乒乓球队的领导工作，你到北京去找符志行，先了解清楚调我们这三个人是哪里推荐提名的，全国各地区一共抽调了多少，已到了多少，是到国家一队还是培训，是选拔、临时性的，还是长久的，通过符志行的关系看能否不调我们这三个人。”

王秉东去北京之后，国家体委已直接派人到上海找军里要接着三个乒乓球队员走，并说的情况是到北京培训的，如果送不到国家队，还保证送回部队。因一个女队员手腕开刀，暂时不能打球，确定不调这个人，郑长华同意调走了两个队员。

王秉东从北京返回上海时，要调的两个队员已调到北京，王秉东到北京找符志行，因符志行已不在体委工作了，只知道是少年乒乓球训练班调的人，其他情况他也不了解，王秉东就回上海了。

三、散布、攻击南空领导的反动言论

1.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向高炮四师的张启文、马金原、赵官政、刘青峰等人散布了攻击南空领导的反动言论，我说：“‘杨、余、傅’反革命事件揭露后，南空领导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搞了反复，搞了扩大化，打击了革命干部，打人，要打白旗，搞体罚，连吉世堂副军长到南京向南空领导汇报时都被打了，据说，当着于应龙副政委就把吉副军长往楼梯下踢，吉副军长身上被打青了几处。”

2. 1970年十月，我在司令部黑骨干讨论王维国讲的在北京解决南空问题情况的会上发言时攻击了南空领导，我说：“我们和南空领导是路线斗争问题，南空领导在‘杨、余、傅’反革命事件之后，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打击、压制了原来的革命派，要搞乱两个军，使南空领导在两条路线斗争上搞了反复，由于至今没有认识、改正错误，所以使南空的问题没有解决。”

3. 1970年十月份，南空后勤李寿山病故后，我向司令部处级以上干部散布过王维国攻击南空领导的言论，我说：“李寿山是受南空领导打击压制的，李寿山有病几次报告南空领导要求到上海住院治疗都没有被批准，以后到上海来治疗时病已经到了后期，已无法治疗，而被耽误了。李寿山的骨灰送到南京后，没有地方放而放到一个小庙里了。”

4. 1970年下半年，军后勤车管科要上海工厂改装了两部救护车，后勤姜玉和军务处王辉章都给我讲过：我们军部换一部新救护车，给南空一部新改装的救护车，并说南空已确定了。我攻击南空领导说：“南空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我们改装的新救护车不要给他们。”

你们说南空已经确定了，还是给他们一部新改装的救护车，这是老观点看问题，南空怎么样，你不给他，我看他也没有办法。”

四、对散布分裂、攻击言论错误罪行的认识

林彪死党王维国大肆造谣、污蔑、攻击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和上海市委的领导，是为了搞反革命阴谋诡计，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军队，分裂党，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我站在错误的立场上，跟着林彪死党王维国散布他们攻击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样起了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反革命作用，适应了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的需要，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服了务，是自己的严重错误罪行。■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

【黑言论】

散布林贼死党江腾蛟、王维国污蔑攻击

南京大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反动言论

一、散布攻击南京大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反动言论

1.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七至六八年）林贼的死党江腾蛟、王维国造谣、污蔑、攻击一贯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南京大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执行了错误

路线，打击镇压了革命群众，不是搞革命大联合，而是支一派压一派”。把他们推行林贼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反革命的分裂阴谋，在南京地区罪恶的支持一派反对南京大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挑起武斗，破坏大联合，破坏无产阶级大革命，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伪装成正确的，来欺骗群众以掩盖他们反革命的罪恶目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在南京开会时和军委叶、杨议论过，在司令部干部会上讲过。

2. 林贼死党江腾蛟、王维国造污蔑、攻击之下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二十七军（实际上也是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在苏州、无锡地区支左“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未被中央指示，把一派从苏州、无锡打出来不让回去。”而林贼死党王维国把他们亲自出马上阵，插手苏南地区“支左”工作，在背后搞阴谋策划，挑起两派武斗，反对二十七军，反对南京大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人民解放军中制造分裂、破坏军队的团结，破坏苏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说成“是执行毛主席指示，给被打击除了的一派做工作，制止两派武斗，创造条件使其返回苏州、无锡，促成了两派的联合。”自我吹嘘“空四军参加苏南地区‘支左’工作是顾全大局，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欺骗、蒙蔽群众，掩盖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勾当。

3. 一九六九年底或七零年初，林贼死党王维国传达死党黄永胜在军委会议上讲：“反许乱军的口号是错误的”，来造谣、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其实反对忠于毛主席、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许司令员，却是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企图分裂军队、分裂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真实目的。

4. “杨、余、傅反革命事件”被揭露后，林贼死党王维国等造谣说“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为请示毛主席、党中央，要接管南京军区空军各机场；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空军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决定，就是针对许司令员的”，来大肆污蔑、攻击许司令员，同时却美化、吹嘘自己如何“正确”的“顾全大局”。以欺骗空四军广大指战员，制造对南京大军区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以适应他们反对许司令员、分裂军队、分裂党、搞反革命阴谋的需要。

5. 林贼死党王维国在传达九届一中全会精神时，也造谣污蔑、攻击了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他说“在开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时，他和陈励耘坐在一起，姚文元同志坐在他们附近，许司令员走到姚文元同志坐的地方时，姚文元同志指着王维国、陈励耘坐的地方对许司令员说：他们两人（王维国、陈励耘）坐在那里，你可以和他们见见面，以示团结。”许司令员听姚文元同志讲完后，转身就走了。造谣、污蔑许司令员，以散步对许司令员的不满。

6. 党的九大后，南京大军区召开党代会时，林贼死党王维国造谣、污蔑说“南京大军区党代大会上二十军如何受到压制，二十军的南萍在军区党代会上如何顶抗军区的领导，如果不是林贼的死党黄永胜给南萍打电话‘做工作’会议就开不下去了。”他们以反革命阴谋手段，混淆黑白，造谣中伤，欺骗蒙蔽群众，来破坏南京大军区的威信，

7. 1970年上半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南、华东地区，途径上海时接见了王维国。林贼死党王维国在传达毛主席接见他的情况时，也造谣、污蔑、攻击了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王维国造谣说：“汪东兴同志说，曾几次要南京大军区在南京给毛主席修建一个住汗腺铁路车站，到现在也没有修建。使毛主席安全上没有保证，乘坐的专车到南京停留，以后毛主席说还是要到南京去停留一下。”林贼死党王维国及时转移卑鄙无耻、不择手段的利用大家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造谣、污蔑南京大军区“不关心毛主席的安全”，来欺骗大家，制造对南京大军区的不满，以达他们反对南京大军区、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恶目的，真实恶毒之极。

8. 1970年部队进行“两忆三查”教育时，林贼死党王维国利用据说是南京大军区政治部给部队印发的一份进行“两忆三查”教育的参考材料，即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XX村革命群众写给我军某某支队的一封感谢信。大肆造谣、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王维国说“感谢信的内容有错误，是散布战争恐怖”。并且还造谣说“姚文元同志看过此信后，也认为此信的内容有错误，是散布战争恐怖，吧一个在地方上和部队进行教育。”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搜集（很可能是捏造的）其他地区的群众来信的名义来证明这封信内容上的“错误”，

对部队中用这封信的材料进行教育的单位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在部队中制造对南京大军区的不满和不信任，破坏南京大军区的威信，大造反对南京大军区的反革命舆论。

9. 1970 年底至一九七一年春，在打击反革命组织“516”时，林贼死党王维国以讲部队反映情况的方式造谣、污蔑、攻击南京放进去在捉“516”反革命分子问题上搞了扩大化。他造谣污蔑说“凡是过去反对过南京大军区和县人武部的人都要被当做‘516’反革命分子来被审查、被打击，并说有时军分区和人武部在关于打击‘516’反革命分子的文件上和公开张贴的选差材料上及标语口号也是这样写的。”林贼死党王维国在打击“516”反革命分子问题上造谣、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证明南京大军区坚决正确的执行了党中央关于打击“516”反革命组织的决定、指示，他们不仅是反对南京大军区，也是直接反对党中央关于打击“516”反革命组织的决定、指示。林贼死党王维国在打击“516”反革命分子问题上造谣、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就是为“516”反革命分子开拓罪责，鸣冤叫屈，妄图掩盖“516”反革命组织继续对他们继续反革命阴谋活动，其用心真是恶毒之极。

10. 1970 年四月间，林贼死党王维国企图掩护和包庇苏州市一个女“516”反革命分子未成，而早已、污蔑、攻击了苏州市的领导，并打击迫害了航空兵十五师的一个副科长。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军党委扩大会（各师及独立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和全军科团干部大会上恶毒批评指责空十五师这个副科长，在处理这个问题“犯了严重错误”时说：苏州市当做“516”反革命分子关起来的一个女人，在被关押期间，她潜逃至北京，中央有关部门要该女“516”反革命分子自己返回苏州市，找原来关押单位处理她的问题，该女“516”反革命分子从北京乘火车返苏州时并未直接到苏州，她先在蚌埠市下车到航空兵 45 师找该师政委关虚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乘火车到硕放车站，也没有回苏州市，而直奔航空兵十五师硕放机场，在苏州市有关部门在硕放车站等接该女人的人，见她到硕放机场就随其后也到硕放机场，要该“516”反革命分子会苏州市。该女“516”反革命分子在硕放机场营门值班室看到苏州市的人来了，急忙将她给林贼死党王维国写的信、从蚌埠到硕放的火车票及其它东西塞进值班室办公桌子的抽屉内。当时在值班室的航空兵十五师一个副

科长，听苏州市来人讲清来意后，即让其将该女人待会苏州市，并将该女“516”反革命分子塞进桌子抽屉的给王维国的信件等物件取出来交给苏州来人带去。林贼死党王维国说这个女人是“造反派”，是不应该被打成“516”分子的。航空兵十五师这个副科长不经请示报告，擅自这样处理问题，特别是把该女人藏在抽屉内的信件等物交给苏州市来人，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要严肃处理，要求各单位都接受教训。杜绝类似这样的问题再次发生。

王维国还说，如果这个女人找到他时，他可以送她到其他地区去当兵。因为这件事暴露了林贼死党王维国与“516‘反革命分子相勾结的机密和他妄图包庇”516“反革命分子的 in 某没有成功，故使他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的对苏州市领导（也是南京大军区）进行了造谣、污蔑、攻击，又要对航空兵十五师坚持原则、正确处理妄图的这个副科长进行打击迫害，这完全暴露了王维国的反革命的面目。

11. 一九七一年初部队进行野营拉练时，林贼死党王维国一方面吹捧浙江省革委会二十军、省军区和空五军的落实工作如何做的好，对拉练部队很关心，浙江省人民很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部队深受教育，并数次派人和写信对其进行感谢；另一方面又造谣、污蔑说：“苏南地区的各级领导不欢迎拉练部队去，地方上对部队进行野营拉练没有很好布置和准备，人民群众对拉练部队不热情，两个省两个样，不是人民群众的问题，是领导问题。”散布对江苏省落实的不满，是王维国一贯造谣、污蔑、各级和反对许司令员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暴露。

12. 林贼死党王维国在谈浙江省文化大革命时吹捧二十军、空五军团结起来支持一派是正确的，污蔑远省军区和南京大军区支持的一派是错误的；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又把在宁波、舟山地区发生的武斗造谣、污蔑为是南京大军区支持的一派反对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武斗的枪支都是军队发给的，这就是浙江省沿海地区发生武斗的原因，来攻击、反对南京大军区。

林贼死党王维国和郑长华都曾多次吹捧过二十军、空五军和空四军是二十九军；二十军、空五军和空四军团结起来可以左右华东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13. 1970年十一月在司令部黑骨干讨论孙洪奎传达的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指示时，其中关于议论“准备应付几股势力冲击”的反动言论问题上，影射几股势力是大军区、上海市委、南京领导和空军领导，散布、攻击了南京大军区、上海市委和南空领导的反动言论。

14. 林贼死党王维国还讲过南京大军区部队不挂林贼像，不用林贼语录，不敬祝林贼身体健康的反动言论来攻击南京大军区。我在司令部黑骨干中有几个干部中业散布议论过。

二、散布攻击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反动言论

1. 1970年下半年，林贼死党王维国在空军十三厂（指国棉十三厂——编者）“支左”问题上数次造谣、污蔑、攻击过上海市委领导。他说：十三厂两派至今不但没有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而且不断发生武斗，打伤、打死人，主要是冲击我们军机关，严重影响了该厂的革命和生产，成为上海市有名的“老大难”单位。上海市工总司王洪文同志支持的一派有的头头有严重的历史政治问题，发动群众不揭露阶级敌人，不搞联合，而是掩护敌人，一定要打击消灭另一派革命群众组织。几次协议都不贯彻执行，那怎么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呢？革委会更成立不起来，我们过去在十三厂“支左”中犯过一些缺点错误，我们公开检查承认错误，我们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是两进两出，空军直接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是两进两出了，我们在十三厂的警卫排也被赶出来了。难道这还是我们的问题吗？今后我们根本不和十三厂发生任何关系，任何问题我们都不插手由他们去搞算了。

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十三厂“支左”问题上造谣、污蔑、攻击王洪文同志的反动言论，我在司令部干部中散布过。

2. 1970年十一月韩洪奎在黑骨干会上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污蔑、攻击上海市委领导同志时说：要组织调查研究总结部队工作经验，指导部队的建设，不要集中人力为报纸写文章、搞报导。“你们四个第一好的那样好的文章还不是被人压起来不准发表，上海市（指的是徐景贤同志）不愿在报纸上登你们的文章，即使登你们的文章，也要搞一碗水端平，

这样登你们一篇文章就要引出登别人几篇文章，你们写了文章人家不愿意在报上登，给你们登，别人没有文章，人家还要去找，甚至帮助写文章登报。所以不要做这样得不偿失、费力不讨好的事。要总结经验，报导部队建设。”林贼死党王维国就因此断定不让向上海市报纸投稿。司令部黑骨干在讨论韩洪奎传达的问题时，我们也议论散布了这些污蔑、攻击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反动言论。

3. 1970年下半年在一次党委会上讨论“支左”工作时，当支左办公室的人讲到徐景贤在某会议上批评我们军在上海市戏剧学校支左人员在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意思是指对过去造反派的头头的缺点错误批判的多了，打击了造反派），要进行检查，严肃处理。林贼死党王维国污蔑、攻击徐景贤同志说：这是有意的扩大，是整人，是攻击，一点不计其余。什么方向路线的错误？造反派头头有严重问题就不能批判了，不管他怎么批评，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就检查什么缺点错误，否则就把我们的人撤出来。这个问题我和司令部个别干部议论散布过。

4. 1970年十二月，在第7次党委会上（军管会的领导也参加了会）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公检法军管问题上造谣、污蔑、攻击上海市委领导同志。他说：现在在公检法军管问题是搞一个专政机构（指公检法）还是搞两个并列的专政机构（另一个指上海“文攻武卫”），在市委展开了争论，实际上是以军管会在专政机构治安上不走群众路线，不依靠“文攻武卫”的罪名来压我们，目的是要把“文攻武卫”组织搞成一个专政的领导机构。“文攻武卫”组织早已可以自己抓人，自己可以牢人，在全国只有上海有这种情况。根据中央的决定指示，只能有一个专政领导机构——这就是公检法军管会，专政机关对敌人实行专政、破案和维持社会治安，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定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群众组织、民兵组织是配合专政机关向敌人专政和维持社会治安，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不能另立专政机构代替专政机关。这是一个组织原则问题，他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管他们怎样呀、怎么围攻，人为的制造矛盾，制造紧张关系，我们在原则问题上

不能让步，要坚持。当然要和“文攻武卫”更主动的搞好关系，密切配合，搞好群众性的保卫工作。

这个问题我向司令部的个别处的干部议论散布过。

5. 一九七一年十月在一次党委会上（军管会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林贼死党王维国污蔑、攻击张春桥同志说：国庆节前夕，他到张春桥同志家里去检查警卫安全工作时，张春桥同志的秘书告诉他说张春桥同志正在忙于修改文件，忙于时间接见他。王维国说：不愿意接见我这是真的，说忙也可以见面打个招呼么。看样子很可能在上海党代大会时要整我们一下。

林贼死党王维国污蔑、攻击张春桥同志的反动言论，我在司令部少数黑骨干中个别议论、散布过。

6. 1970年十一月在军政治部会议室召开的军常委扩大会上（各部的领导干部、军管的副主任们都参加了，胡开德同志也参加了。我先在党委会会议室向空军军务部杨彩章部长汇报军部的编制问题，会议后期在讨论时采取参加），林贼死党王维国造污蔑、攻击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否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王维国说：上海革委会组织领导的给上海市委党代大会起草的政治报告第一稿上，对人民解放军只提了一句；第二稿上对人民解放军连一句也没有提。这不是“否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靠三条：一是没则显得英明领导；二是靠广大的革命群众；三是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是不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这一条的。

我在司令部少数黑骨干中个别议论散布过这个反动言论。

7. 1970年下半年，一次党委会在讨论出息上海市党代大会的代表名单时，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召开上海市党代大会问题上造谣、污蔑、攻击了上海市革委会的领导。他说：召开上海市党代大会，推选出席党代大会的代表，酝酿讨论新市委人员、正副书记及常委人数和差选人等准备工作，在地方上早就通知进行了，马上就要召开党代大会的预备会，才通

知污蔑，这不是工作上的疏忽，而是有意的搞突然袭击使我们来不及准备。现在有些人为了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被选入新市委书记，到处吹捧周纯麟通知，甚至把周纯麟通知说成是“九大”的代表和候补中央委员，这不是事实（王维国是“九大”代表和候补中央委员——编者）。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周纯麟进入市委书记处，我是同意的，张春桥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是这样表态的，地方上在讨论新市委候选人时反映了很多好的意见，但这些群众的意见是反映不到上面去的，也不会和代表们见面的，因为候选人的人数和人选在领导上已经定了。

林贼死党王维国以上召开上海市党代大会问题造谣、污蔑、攻击上海市委领导的反动言论，我在司令部少数处长中议论散布过。

8. 林贼死党王维国还多次对上海市开会不用林贼语录和敬祝林贼身体健康一事攻击了上海市委的领导，他说，“有的发言稿上写了林贼的语录也被勾掉了”，以散布对上海市委领导的不满。执行反动、攻击言论，我在司令部的干部中业散布过。

三、对散布攻击许司令员和上海市委领导的反动言论、错误罪行的认识

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造谣、污蔑、攻击许世友司令员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反对许司令员和上海市委的领导是为了破坏党的条件、分裂人民解放军、分裂党，是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我跟着林贼死党王维国等人，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散布、攻击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许世友司令员和上海市委领导，适应了林贼及死党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同样起了反对许司令员和上海市委领导、破坏军队的条件、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军队、分裂党、推行林贼及其死党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革命的作用，是我在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犯的严重错误罪行。■

【黑措施】

关于贯彻执行林贼的“两打”和《空军作战文件》的问题

一、贯彻执行林贼的“两打”问题

1. 自一九六九年加强战备时林贼提出“两打”以后，总参、空军、南空和军里每年布置训练工作时都把“两打”作为训练的重点内容，进行贯彻执行的。1970年十月份，郑长华主持召开军的训练会议，进一步强调贯彻落实林贼的“两打”，并提出了各兵种进行“两打”训练的重点、内容要求，规定了各部队围绕“两打”进行兵器技术革新的项目和任务。甚至王维国提出要“543”部队也要研究打地面和海上目标的问题。司令部按王维国、郑长华的布置要求，组织进行了“两打”训练和技术革新工作。

2. 1970年、七一年高炮实弹射击时，王维国都提出：除对空中目标射击外，还要对坦克、地面目标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因我思想上认为高射炮兵主要是对空中目标射击，所以在训练计划上仍然规定以对空中目标射击训练为主。实弹射击时，对坦克、地面目标的射击只搞了少数炮的试验射击。一九七一年下半年高炮部队准备在总结对坦克、地面目标进行试验射击的经验之后，再在部队普遍组织打坦克、地面目标的训练，以后也没有进行。

3.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王维国在军党委会上布置工作时，亲自给高炮三、八师的领导干部交待，要他们每个师各以一个小炮营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的试点训练，在取得经验后，再普遍组织轻武器的训练，为了摸索，我派训练处郭希洪到高炮八师进行轻武器试点训练，23团小炮营帮助进行领取完全的试点训练。由于上级批准高炮部队在五月份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两个高炮师搞的轻武器试点训练，搞了没有多久就结束停止了，以后我们也没有按照王维国的要求普遍组织进行。

4.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王维国在常委会上提出说他“和车香友、魏士英一起议论酝酿，认为上半年主要是进行了政治路线教育，这完全是正确的，部队路线觉悟有很大的提高，

为全军工作打好了基础，相应的在军事训练进行的少一些也是应该的。根据上半年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情况和部队现在的技术水平情况，一致认为有必要从现在起至十一月，应该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在全军掀起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应集中时间和领导精力组织部队进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技术水平。要求飞行部队每月不少于组织进行10—12个飞行日子，其他部队也要以主要时间组织进行军事训练。”王维国的这个意见经常委讨论同意后，即以军常委会纪要的名义通知各师团讨论布置。

接着王维国在连以上干部（部队是科团干部参加）会上作了关于掀起训练高潮的动员报告，中心意思是：要精神变物质，要集中主要时间和领导精力组织进行军事训练，立即掀起军事训练新高潮。王维国、郑长华为了检查贯彻落实情况，随即又召开各师团领导干部开会汇报各部队为掀起军事训练新高潮的具体安排情况和采取的措施。包括在掀起训练高潮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以主要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在训练时间、内容上安排是否体现，集中主要精力加强训练工作的组织领导，在组织措施上是否落实。经过王维国以上的组织动员，当即在部队掀起了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

司令部为了适应王维国提出的在部队掀起军事训练新高潮的情况和要求，除抽派大部分人组织工作组随军、部队领导干部到部队直接参加推动训练工作，帮助指导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外，还组织了一个管训练工作的小组专门负责及时了解、掌握、反映与通报各部队的训练情况，提出解决训练中的问题，及时介绍训练经验，以指导和推动部队的训练工作。

二、关于贯彻执行《空军作战文件》的问题

《空军作战文件》（即王维国所称的林立果组织起草的关于未来反空袭作战若干问题的研究文件）是在一九六九年十一、二月间空军党委开会时作为会议文件提出来的；1970年下半年以空军党委的名义正式下达到部队的。

一九六九年底开完空军党委会后，王维国分别在1970年一、二月召开常委扩大会、军党委扩大会传达空军党委会议精神时都传达了《空军作战文件》（作为会议文件），吹捧该文件“是林立果学习、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贯彻作战方针原则、指导和解决未来反空袭作战问题的典范”。并在三月份组织了师团指挥员学习班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以该文件为依据，学习毛主席有关军事著作和该文件，研究了未来防空作战计划方案的问题。

司令部为三月份组织的师团指挥员学习班做准备，于一、二月份组织了参谋人员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有关军事著作和该文件，并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作战原则为指针、以该文件为依据讨论、研究、制定有关未来反空袭作战计划问题的方案材料。

一九七一年三、四月王维国在军常委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在全军普遍组织学习林立果组织起草的、空军党委下达的《空军作战文件》，以《空军作战文件》为依据组织进行部队的战备训练，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在普遍组织学习的基础上由下而上的研究、解决战备训练中的问题和未来反空袭作战的问题。并确定将在下半年再次组织师团指挥员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有关军事著作和《空军作战文件》，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以《空军作战文件》为依据，研究制定军的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反空袭作战的计划方案。”

1.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交代作战处叶蜚闻负责组织研究提出关于在部队普遍组织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空军作战文件》的实施方案，作战处提出的学习《空军作战文件》的方案，是经我看过同意、最后由郑长华批准的。

2. 组织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贯彻落实《空军作战文件》的试点，为了取得经验指导部队普遍学习该文件，我们于六、七月先后在高炮三师八团七连、七团二连、雷达三十一团老港九连、独五师九营等单位毛主席军事著作和学习贯彻《空军作战文件》的试点，研究总结了试点经验，军并派了成应林同志参加了高炮七团二连的试点。

3.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军召开的师团领导干部、作战和训练股科会议上，介绍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空军作战文件》的试点经验，布置了下半年在部队普遍组织学习毛主席

席军事著作和贯彻落实《空军作战文件》的问题（同总参“小型作战会议精神”、“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一起传达的）。

根据《空军作战文件》内容确定了学习研究专题内容，规定了学习毛主席有关军事著作的内容。具体方案内容是：

学习毛主席有关军事著作和《空军作战文件》，提高认识，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以《空军作战文件》为依据，统一作战指导思想，联系实际研究解决战备训练中的问题，进一步研究解决未来反空袭作战的问题，并研究制定未来反空袭作战的计划方案。

4. 我交代作战处叶蜚闻做准备，准备在部队普遍组织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贯彻落实《空军作战文件》之后，军里再次组织师团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空军作战文件》，提高认识，以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指针，以《空军作战文件》为依据，根据部队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作战指导思想，研究制定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反空袭作战的计划方案。

三、对贯彻执行“两打”、法西斯分子林立果黑文件（《空军作战文件》）的严重错误罪行的认识

林贼“两打”和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文件是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是其反动军事路线的主要内容。林贼死党王维国等积极贯彻执行“两打”和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文件，完全是为了推行林贼的反动路线，为他们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搞反革命政变在军事上进行准备的。

我错误认为是在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而按林贼死党王维国的布置、要求，组织、贯彻执行了林贼的“两打”和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文件，执行了他们的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服务、做准备，完全适应了林贼死党王维国搞反革命活动的需要，是我严重的错误罪行。■

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

【黑措施】

王维国向高炮三、八师布置进行 轻武器和地面战术试点训练问题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王维国在军党委会上布置工作时，亲自给高炮三、八师的陈耀贵、刘青峰、王宝奎交待布置：“要高炮三、八师各以一个小炮营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的试点训练。在试点训练之后，再在部队普遍组织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的训练。”王维国直接向高炮三、八所布置组织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试点训练之后，司令部再没有向高炮三、八师布置过关于组织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工作训练的问题，也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要求。高炮三、八师根据王维国的布置分别在高炮九团三营和二十三团三营组织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工作的训练。

根据王维国在党委会上的布置（交待高炮三、八师各一个小营炮组织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工作训练），为了解情况，摸索总结经验，指导部队训练。我派训练处共同科目参谋郭希洪到高炮八师二十三团三营参加了高炮八师组织的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训练，郭希洪也是断断续续的参加了二十三团三营的一些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训练。由于上级批准高炮部队在同年五月份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两个高炮师组织进行的勤务和地面战术动作训练搞了没多久就停止了（在高炮实弹射击前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训练怕影响高炮的实弹射击，以后就参加了高炮实弹射击）。

以后我们也没有组织总结试点训练经验，也没有按王维国的要求在部队普遍组织进行。

■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黑措施】

在军事工作上执行了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 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黑措施

关于按照王维国、郑长华的黑决定调动

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问题

1. 王维国、郑长华交待布置的任务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一天（大概是四月六、七日），正在开军党委（扩大）整风交心会时。郑长华临时把魏忠锦、陈耀贵、刘青峰、王宝奎、车香友、魏士英和我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们说：“现在外面情况比较紧张，社会情况也比较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防止冲击，加强军机关和江湾机场的警卫防护，保证军机关好江湾机场的安全起见。王维国和我们一起研究确定，军里需要抽调、掌握一点机动部队，现在就是要和你们研究一下，看高炮部队在不影响战备任务的情况下，能抽出几个连队来。”

经大家具体研究，只有高炮三师的四个高机连因没有阵地，暂住在地方上的学校内，没有担任战备任务，能抽调出来（其中包括已报上级批准要到军指挥所担任修建任务的高炮八团高机二连）。郑长华接着说：“那就确定抽调高炮三师这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来驻。到江湾机场驻的高炮三师高机连和原来就驻在江湾机场的高炮23团高机连在担任警卫防护机场任务上统一归26师组织指挥。”

我当时提出要调动的三个高机连（除已报请上级批准到指挥所担任修建任务的高炮八团高机连）是否要报请上级批准后行动？郑长华说：“这三个高机连都没有担任战备任务，又不要批准解除战备任务，不要向上级报告了。这几个高机连的调动和到军部、江湾机场的具体驻地由司令部组织具体安排。”大家都同意抽调高炮三师这几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

湾机场之后，就继续去参加党委整风交心会了。

我当时认为郑长华讲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防止冲击，加强军机关和江湾机场的警卫，防护、保卫其安全起见，抽调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来”是针对上海市和南京大军区的。因为韩洪奎 1970 年十一月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指示时就讲过：“要准备应付几股势力的冲击”。同时我认为调几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来，也可能是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来上海新华一邨的担任警卫任务，保证安全的。因为当时已听说新华一邨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在修理住房。

郑长华交待布置抽调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之后，我们研究提出四个高机连的住地布置是：一个高机连仍按原计划（上级批准的）住军招待所（公园附近）担任修建任务；两个高机连住军指挥所附近原值班战勤人员休息的房子；一个高机连住到江湾机场，郑长华同意这样住法。

一天办公后，王维国、郑长华在会宿舍的路上，我向王维国汇报了关于四个高机连住地的布置意见，并实际指出住军部两个高机连的地点。王维国当时不同意在军部住两个高机连，他说“高机连在军部目标太大”，王的意见“要把高机连布置到江湾机场去”。我说：江湾机场没有房子住，军部去年修建防空洞时，也住过两个高机连，现在在军部住两个高机连影响不大（因我不理解王维国要高机连住江湾机场的原意，所以我仍然解释，坚持自己的意见）。王维国说：江湾机场没有房子，高机连可以在飞机库里。郑长华说：他们都准备好了，我看就这样住吧，军部住两个高机连关系也不大，过去军部战勤时，雷达团的指挥连和通讯营的几个连几百人都住在军部，现在都去新指挥所了，军部减少了三、四个连队，部队在军部住两个高机连还是可以的。这时王维国才勉强同意在军部住两个高机连，并交待：要晚上进来，要尽量减少目标。

紧接着王维国在一次常委办公会上提出：高炮三师这四个高机连和高炮八师的两个高机连（包括在苏州广祐洞库机场秩序警卫任务的一个高机连）长期分散执行任务，领导薄弱，现在要专门抽调几个团营干部组织一个领导班子，组成临时党委统一和加强对这几个

高机连的领导，以加强其建设。

王维国提出六个高机连要专门组织一个领导班子来统一领导之后，郑长华、姬应伍、魏忠锦及其他常委都表示同意，当时就议论到六个高机连组织领导班子叫什么名称的问题，大家就提出叫机动营（文化革命时期组织过）、高机营或高机团等。王维国说都不合适，而此高机营、团的正式建制番号必须报上级批准才能成立。我说：去年我们军部抽调两个高机连修建防空洞时，是由修建办公室的领导的。王维国说那就还叫修建办公室好了。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叫修建办公室，军党委批准临时成立的党委也叫“修建办公室临时党委”。

关于调动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的问题，王维国、郑长华就交待布置了以上任务，以后再没有讲过别的问题、交待其他任务。

2. 我执行情况

（1）向军机关有关部门布置情况

王维国、郑长华交待布置调动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的任务之后，我首先召集军司、政、后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开会作了布置。参加会议的人有：司令部的裴寿生、王辉章、叶蜚闻、王恒阳、政治部的潘玉昆、徐多义、后勤部的朱潜等人参加。我说：军常委确定抽调高炮三师没有担任战备任务的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来，加强军部和江湾机场的警卫，保证其安全，这也是路线斗争的需要。并确定组织一个领导班子，统一和加强对高炮三、八师几个高机连的领导。因此，请司政后有关部门为组织调动着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进行以下准备工作：

干部处负责尽快的在高炮两个师选调四、五个各营团干部以便组成领导班子；由徐多义负责准备在高机连到达军部后，给他们讲讲有关警卫、保卫工作方面的问题和应注意的事项，并统一组织军部的警卫、保卫工作；通讯处负责组织解决各高机连的领导班子（修建办公室）通讯线路和江湾机场住的两个高机连通 26 师指挥所的通讯线路问题；管理处负责解决军部两个高机连和住指挥所一个高机连（担任）、修建任务的）住房问题，并帮助

解决其他生活上的问题；高炮处负责帮助解决有关训练的问题；后勤部负责和 26 师协商解决住在江湾机场高机连的住房问题，和有关高机连的生活物资的供应问题。

在调动高机连的问题上我交待王辉章办理以下事情：（见已写的材料）

根据王维国、郑长华交待布置的任务，特别是对六个高机连成立了专门领导班子，我认为三师四个高机连住在军部和江湾机场时间可能较长。因此，在以后，我又要管理处负责在军部专门给高机连修建了一个伙房和几间房子；给临时住在江湾机场机库内的高炮三师高机连修建了住房，也计划准备给在指挥所担任修建任务的高炮三师高机连修建住房。

（2）我给高机连连以上干部交待任务、布置工作的情况：

我向军机关有关部门布置组织调动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的问题之后，政治部迅速选调了高炮八师任汉轩及一个政治指导员，高炮三师的张学良及一个营长组成了六个高机连的领导班子（由张、任二人负责）。四个高机连分别到达军部和江湾机场之后，我召集几个高机连的领导干部和领导六个高机连的领导班子的四个干部交待布置任务和工作如下：

我说：这次军常委决定调你们这几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执行任务，是路线斗争的需要，你们是作为全军掌握的机动连队被调来的，这也是军党委对你们的信任。在这里执行任务的时间可能较长，因此要安下心来，不要有临时观点。你们的任务是：1. 调你们来的任务是加强军部和江湾机场的警卫和防护，保证军机关和江湾机场的安全；2. 住在军机关的两个连担任军机关的警卫任务，保证军机关的安全；3. 住在江湾机场的高炮三师一个高机连和原来的 23 团高机连，担任江湾机场的警卫和防护，保证其安全，在担负该机场警卫、防护任务时归 26 师统一组织指挥；4. 住在军指挥所的一个高机连也有担任指挥所警卫的任务。当前因要担负修建任务暂时可以不担任警卫任务；5. 以后还可能担负其它的机动军党委任务（意思是指可能担负新华一邨的机动警卫任务）；6. 还要准备担任军机关的一部分修建任务，要组织好值班，特别是在夜间要有应付紧急情况的准备。这就是你们要担负的任务。

你们六个高机连过去长时间分散执行任务，对你们的领导注意不够。为了加强对高机

连的领导和建设，军常委确定由任汉轩、张学良负责组织了一个领导班子，还要成立临时党委，除建制供应关系、干部工作不变，仍归各师各团统一领导。六个高机连新的领导工作大胆负责，对各连进行领导，各连的干部大家要尊重领导，加强团结，搞好上下之间的关系，把各连的工作搞好。

今后在政治教育、政治工作、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工作上直接按军里的布置进行，军事训练上要巩固和保持高射机枪的操作技术，还要参加高炮部队的实弹射击训练，当前因为你们是担任警卫任务，在保持高射机枪射击操作技术的情况下可适当地多进行一些轻武器的训练，并进行必要的制式教练，在指挥所担任修建任务的高机连政治教育、军事训练课适当进行调整，并利用施工间隙时间进行教育和训练。

要抓好对连队作风的培养和锻炼，工作上要认真负责，雷厉风行，高标准，要发扬“三八作风”，加强组织纪律性，连队生活要紧张，一定要保持和发扬连队优良作风，不要受机动的影响。

我还向任汉轩、张学良同志交待要做以下事情：

- (1) 要他们看一下军部院内的地形，以便对空作战任务时兵器能进行展开。
 - (2) 要他们把个高机连所缺的轻武器数目报给军务处，由军务处负责给补发设备，以便进行训练和担任警卫工作。
 - (3) 要他们根据抓基层的要求，有计划的深入到各高机连，一个连一个连的了解，摸清各连领导班子及领导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帮助加以解决。
 - (4) 要他们按对警卫领导战士的要求、条件对战士普遍进行一下政审，如有不适合做警卫任务的战士要适当进行调整。
 - (5) 我曾告诉他们各连也可以组织学习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
 - (6) 我还告诉他们由我负责他们的工作，我不在家时有什么事可找裴斐解决。
3. 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调到军部、江湾机场后的机动情况：

- (1) 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调到军部和江湾机场，五、六月间参加高炮部队在奉贤靶场

进行实弹射击。

(2)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基本上都是参加军部的修建施工任务。

(3) 一九七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十七日是我建议参加由高炮八师负责统一组织的准备国庆节检阅的训练。

(4) 住在军指挥所担任修建任务的高机连从调去至八月中一直都是进行施工任务的。

(5) 高机连到军部原政治教育的内容和部队一样，军事训练除进行高射机枪对空射击操作技术训练、一般的轻武器训练和必要的队列制式训练外再没有进行其它的训练。

除以上活动、教育、训练外，也再没有组织别的活动。

(6)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晚，郑长华向我传达伟大领袖下令逮捕林贼死党王维国进行隔离审查、交待问题之后，要我负责调动高机连担任警卫任务，把蒋国璋、裘著显、左平、韩洪奎等十四人进行隔离审查。我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对林贼死党王维国进行隔离审查，坚决表示要与王维国划清界限、进行斗争的命令，迅速、坚决地组织高机连完成了对蒋国璋等十四人进行隔离审查的警卫任务。

4. 对调动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的错误罪行的认识

林贼死党擅自决定调动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完全是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而我却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听信他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防止冲击，加强军机关和江湾机场的警卫防护，保证其安全起见，抽调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来”的鬼话，执行了他们的黑决定，组织调动了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同意他们违背中央军委关于部队调动的规定，破坏军队的组织纪律性而没有坚持上报，并为他们提供了“修建办公室”的名称（领导六个高机连的领导班子的名称），完全适应了林贼死党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是我严重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